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核心期刊
- ★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
- ★ 中国农林核心期刊
- ★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第一批认定学术期刊
- ★ 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全文收录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主办单位 中国农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指导单位 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
协办单位 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
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农业行业分会)
农业农村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处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WORLD AGRICULTURE

世界农业

刊名题字：吴作人
1979 年创刊
月 刊



世界农业编辑部
微信公众号

总字第 548 期
2024 年第 12 期

世界农业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马有祥

副 主 任 (按姓氏笔画为序)

广德福 马洪涛 朱信凯 刘天金 杜志雄 何秀荣 张陆彪 顾卫兵 隋鹏飞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林萍 韦正林 仇焕广 孔祥智 叶兴庆 司 伟 吕 杰 朱 晶 朱满德 刘 辉
刘均勇 李先德 李翠霞 杨敏丽 吴本健 宋洪远 张林秀 张海森 张越杰 陈昭玖
陈盛伟 苑 荣 苑 鹏 罗小锋 罗必良 金 轲 金文成 周应恒 孟令洋 赵帮宏
赵敏娟 胡冰川 姜长云 袁龙江 聂凤英 栾敬东 高 强 黄庆华 黄季焜 程国强
蓝红星 樊胜根 潘伟光

主 编 刘天金

副 主 编 赵立山 张丽四

执行主编 贾 彬

责任编辑 卫晋津 张雪娇 李 辉

编 辑 吴洪钟 汪子涵 陈 璠 程 燕

SHIJIE NONGYE

出 版 单 位 中国农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印 刷 单 位 中农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北京 782 信箱)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18 号楼

邮 编 100125

出 版 日 期 每月 10 日

电 话 (010)59194435/988/990

投 稿 网 址 <http://sjny.cbpt.cnki.net>

官 方 网 址 <http://www.ccap.com.cn/yd/zdqk>

定 价 28.00 元

广告发布登记:

京朝工商广登字 20190016 号

ISSN 1002 - 4433

CN 11-1097/S

◆凡是同意被我刊发表的文章, 视为作者同意我刊将其文章的复制权、发行权、汇编权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转授给第三方。特此声明。

◆本刊所登作品受版权保护,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摘编。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畜牧业绿色发展的现实基础、国际镜鉴与路径指向	赵敏娟 杜瑞瑞 (5)
县域涉农富民产业形成机理、培育困境及破解路径 ——基于产业链一体化的视角	庄天慧 邱 峰 (16)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理论逻辑、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	闵 师 青 平 (26)
农产品电商发展现状、困境与未来支持政策	罗 猛 林万龙 (37)
以特色康养文旅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逻辑建构、机遇挑战与路径探索	许佳彬 李翠霞 (51)
乡村产业发展助力农民增收的困境、路径与政策保障研究	洪甘霖 钱文荣 (63)
金融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刘 丹 张龙耀 (74)
乡村产业振兴视域下农地集中流转与地租上涨 ——基于地租理论的分析	刘 进 饶清玲 (86)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作用机理、国际经验与发展路径	李 剑 常 青 (97)
投保农户兼业化对农业保险道德风险的影响效应及实证检验 ——以玉米种植保险为例	苑浩然 陈盛伟 牛 浩 (107)
其他	
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与贸易形势月报(第36期)	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预警救济专家委员会 (120)
国际粮农动态：报告指出不健康的膳食结构给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每年造成超8万亿美元的隐性成本等2则	(124)
2024年11月世界农产品供需形势预测简报	张明霞 (127)
农业贸易百问：美国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的发展现状、支撑因素及经验借鉴	王晓丽 (131)
基于SWOT分析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农业合作探究	徐佳利 魏田军 宛虹翔 等 (136)
面向未来的农业文化遗产：传统农业、林业、渔业和文化 ——第八届东亚地区农业文化遗产大会综述	陈 喆 焦雯璐 闵庆文 (140)

Realistic Basis, International Lessons, and Pathways for Green Development in Animal Husbandry
in the Contex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asks
..... ZHAO Minjuan, DU Ruirui (5)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Cultivation Challenges, and Solving Path for Agriculture-related
County-Level People-Enriching Industr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Chain Integration
..... ZHUANG Tianhui, QIU Feng (16)

The Role of Regional Public Brand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Theoretical Logic, Realistic Challenge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 MIN Shi, QING Ping (26)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Dilemmas, and Future Support Policies for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 E-commerce
..... LUO Meng, LIN Wanlong (37)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through Characteristic Health and Wellness
Cultural Tourism: Logical Construction,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Path Exploration
..... XU Jiabin, LI Cuixia (51)

Research on the Dilemma, Path and Policy Guarantee of Rural Industries Development to Boost
Farmers' Income Augmentation
..... HONG Ganlin, QIAN Wenrong (63)

Financial Support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Optimized Paths
..... LIU Dan, ZHANG Longyao (74)

Centralized Circulation and Rising Land Rent in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A Viewpoint of Land Rent Theory
..... LIU Jin, RAO Qingling (86)

Digital Economy Empowers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Mechanisms, Foreign Experience and
Development Path
..... LI Jian, CHANG Qing (97)

The Effect and Empirical Test of Concurrent Farming of Insured Farmers on Moral Hazard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A Case Study of Maize Planting Insurance
..... YUAN Haoran, CHEN Shengwei, NIU Hao (107)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畜牧业绿色发展的现实基础、国际镜鉴与路径指向

◆ 赵敏娟^{1,2} 杜瑞瑞¹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杨凌 712100;

2. 西安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西安 710100)

摘要: 畜牧业绿色发展是实现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要求。对标高质量发展要求,本文围绕畜牧业绿色发展四方面重点任务,系统阐述了中国畜牧业绿色发展的现实成就,主要体现在粪污资源化利用获阶段性成效、农牧循环发展机制稳步推进、减污降碳协同能力不断增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逐步提升。同时,畜牧业绿色发展也面临科技创新与应用相对滞后、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各参与主体动力不足等挑战。立足中国畜牧业绿色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本文进一步分析并比较了欧盟、美国、日本、韩国等典型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推动畜牧业绿色发展中的实践经验,提出制定系统绿色发展战略规划、完善科技创新与推广体系、加快畜牧业全产业链紧密融合、激励多主体参与等做法具有借鉴价值。最后,结合中国畜牧业发展的背景及目标,从科技、制度、产业、主体建设四方面提出中国畜牧业绿色发展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 畜牧业; 绿色发展; 现实基础; 国际经验; 实现路径

DOI: 10.13856/j.cn11-1097/s.2024.12.001

1 引言

近年来,中国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逐渐成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保障食物安全的战略产业以及农业现代化的标志性产业^[1]。同时,立足贯彻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等重大决策,畜牧业“保供给、保安全、保生态”的压力不断增大^[2]。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将持续推动畜牧业绿色循环发展作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紧扣高质量发展任务,推动畜牧业绿色发展关键在于统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畜禽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推进畜禽养殖和环境保护,最终实现畜牧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行动方案”“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草原生态保护与修复”“粮改饲政策”

收稿日期: 2024-10-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双碳’目标下农业绿色发展体系创新与政策研究”(22&·ZD083)。

作者简介: 赵敏娟(1971—),女,陕西兴平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自然资源管理、农业可持续发展, E-mail: minjuan.zhao@nw-suaf.edu.cn; 杜瑞瑞(1995—),女,山西忻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畜牧业绿色转型。

等系列部署及地方实践,中国畜牧业在生产布局优化、农牧循环发展、生产效率提升和绿色安全养殖等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3-4]。同时,国内居民肉蛋奶等消费快速刚性增长和农业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矛盾依然尖锐^[5]。畜牧业绿色发展仍然面临生产方式高消耗、生产效率低水平、温室气体短期下行难度大、绿色畜产品供给不足、支持保障体系不健全等现实问题^[6-7]。

现有关于畜牧业绿色发展的研究主要围绕基本内涵、现实基础和实现路径等方面展开。就基本内涵而言,贾云飞等结合“绿色发展”定义,指出畜牧业绿色发展蕴含“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产品安全、产出高效”的深刻内涵^[3];“双碳”目标提出以后,统筹考虑畜禽养殖产品供给安全与气候安全,有效降低碳排放成为畜牧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7]。就现实基础而言,宏观研究多借助全要素生产率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方法分析畜牧业绿色发展整体水平及时空演变特征^[8-9];微观研究多从种养结合或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等绿色养殖技术的采纳行为及效果考察畜牧业绿色发展的问题及成效^[10-11]。就实现路径而言,学者们普遍指出加快推进畜牧业绿色发展,要从现代化、生态化和可持续化的目标出发,高度重视绿色科技研发与采纳、激励约束制度体系完善、因地制宜创新养殖模式等^[12-13]。毋庸置疑,已有研究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证基础,但仍存在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地方。一是随着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任务关于绿色内容的明确,以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的强化,畜牧业绿色发展被赋予更为清晰的方向,即全面推进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促进农牧循环发展和绿色养殖。然而,围绕这一明确任务,对中国畜牧业绿色发展进行整体评价和未来研判在现有研究中是缺乏的。二是产业发展本身存在一定的固有规律,发达国家在畜牧业发展中所处的阶段虽然不同,但不同国家在畜牧业绿色发展中存在一些共通性、规律性的经验做法,尤其是畜牧业绿色发展成效显著的国家案例,对于推进中国畜牧业绿色发展是值得借鉴的。因此,有必要从国际比较层面归纳世界典型国家畜牧业绿色发展的成功经验并总结政策启示。

鉴于此,本文紧扣高质量发展任务下畜牧业绿色发展的目标要求,深入剖析中国畜牧业绿色发展的现实成就及突出问题,分析并总结提炼典型发达国家畜牧业绿色发展的主要做法及对中国的启示,最后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畜牧业绿色发展的实现路径。

2 中国畜牧业绿色发展的现实基础

中国畜牧业发展理念随着国情变化而不断演变,展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点。2011年以前,畜牧业发展主要聚焦畜产品结构优化与产业效益提升。2012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的出台,标志着畜牧业转向生态健康养殖的新纪元。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将推动畜牧业绿色发展作为核心任务,重点推进粪污资源化利用、农牧循环发展、减污降碳行动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四方面的内容。

2.1 策应相成,粪污资源化利用获阶段性成效

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方面,政策引领与地方实践共同推动并取得显著成效。2001年《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颁布,首次将畜禽粪便的处理利用提到国家政策层面。随后政策体系不断完善,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提供了全面指导。同时,各地在政策实践中探索出多种资源化利用模式。畜禽粪便通过肥料化、能源化、饲料化等多种途径实现再利用。其中,肥料化利用成为主流,通过生物技术处理将畜禽粪便转化为优质有机肥,提升土壤肥力;能源化利用通过厌氧发酵等技术生产清洁能源,实现能源的循环利用。截至2020年底,中国13.3万家大型畜禽规模养殖场已全部配套畜禽粪污处理设施装备,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超过95%,为有效处理畜禽粪污提供了有力保障。“十三五”期间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跃升至75%,并在2023年进一步攀升至78.3%。

2.2 因地制宜，农牧循环发展机制稳步推进

农牧循环模式作为现代农业与畜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模式，同时引领了中国畜牧业绿色发展。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农区、农牧交错带、草原牧区以及南方草山草坡四大区域通过实践探索，形成了各自的农牧循环模式。农区的农牧循环机制核心在于构建科学严谨且约束有效的农副产品饲料化利用制度，以及种养循环协同发展机制。2021年，全国秸秆饲料化利用量已跃升至1.32亿吨，饲料化利用率高达18%，相较于2018年，实现了3.7%的显著提升。在农牧交错带，以恢复并增强草原的生产潜力和发展草食畜牧业为目标，大力推行“粮改饲”等重大政策^[14]，统筹安排青贮饲料作物和优质牧草种植，立足为养而种，推动过腹还田，实现草畜平衡、循环利用和均衡发展。截至2023年，全国完成“粮改饲”面积2325万亩^①，收储优质饲草约6850万吨，带动减少牛羊精饲料消耗近1300万吨，为农牧交错带均衡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在草原牧区，国家草原保护修复工程成效斐然，2020年种草改良面积突破4245万亩，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提升至56.1%，天然草原牲畜超载率下降至10.1%，鲜草产量大幅增加至11.13亿吨。在南方草山草坡地区，大力实施“现代草地畜牧业推进行动”项目，加大草山草坡的改造利用，种草养畜。以云南省为代表，在项目实施期间，18.3万亩天然草地得到改良，新增人工种草面积12.8万亩，划区轮牧、休牧围栏面积显著增加至26万亩，为南方草地畜牧业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2.3 双管齐下，减污降碳协同能力不断增强

中国畜牧业绿色转型的核心在于转变生产模式，由单纯追求产量向质量与效率并重转变，并坚定地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绿色发展道路。图1展示了2011—2021年中国畜牧业污染排放强度和畜牧业碳排放强度的变化趋势。“十二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阶段，城乡居民畜产品消费快速增加，带动畜牧业迅速发展，同时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政策体系初步形成，相关政策致力于在动态变化的现实条件下探索并实践兼顾经济与生态平衡的方案，因而此阶段政策表现出徘徊特征。加之政策执行初期存在政策手段单一、执行和落实偏差等问题，畜禽污染治理实际效果不稳定^[15]，畜牧业污染排放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呈现波动式下降。2016—2021年，《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行动方案（2017—2020年）》《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规划（2016—2020年）》等政策文件密集出台，畜牧业减污降碳进入快速发展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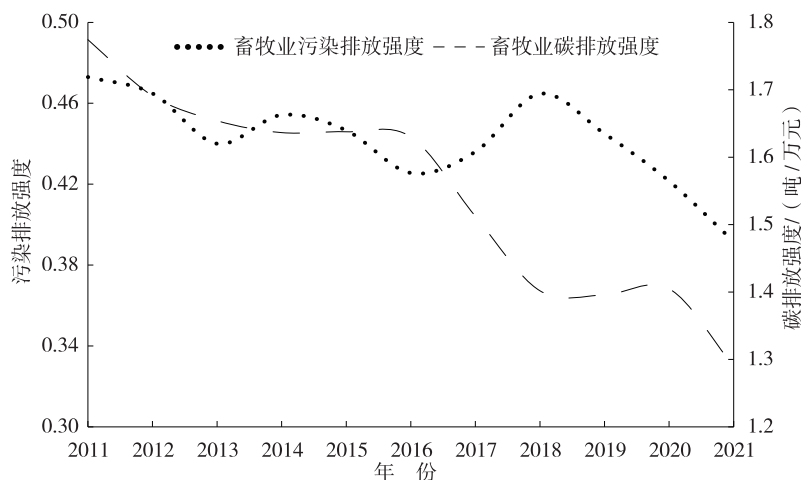


图1 2011—2021年中国畜牧业污染排放强度和碳排放强度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其中畜牧业污染排放强度，参考相关研究，将单位产值的各类污染物（包括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和总磷）排放量进行标准化后得到污染排放强度综合指数。

① 1亩=1/15公顷。

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的资金支持与政策导向明显增强，带动畜牧业污染排放和碳排放强度的快速下降。综上，畜牧业减污降碳二者在政策实践中密切相关，在协同推进中取得显著成效。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民膳食结构向高蛋白方向转变，肉蛋奶需求量增加，畜牧业污染排放量和碳排放量的绝对值在 2020—2021 年均显现出回升趋势。因此，未来仍需持续强化绿色政策引导与绿色技术创新，以实现中国畜牧业长期稳定的绿色发展。

2.4 逐绿而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逐步提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不仅综合考虑了畜牧业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本及中间消耗）的利用效率，而且将污染物排放、碳排放等环境因素纳入分析框架，是全面评估畜牧业绿色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16]。通过对 2011—2021 年中国畜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分解可以观察到其动态变化的显著特征。如图 2 所示，2011—2016 年，畜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经历了一段初期的小幅上升后逐渐下降，而后在 2017—2021 年表现为先稳步增长，经历短暂回调后再次迎来显著上升的复杂态势。整体来看，2011—2021 年畜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 0.59%，累计增长了 5.77%，反映了畜牧业在绿色发展道路上取得的积极成效。与此同时，畜牧业绿色技术进步年均增长 0.82%，畜牧业绿色技术效率年均下降了 0.11%，表明中国畜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源于绿色技术进步，也进一步说明在当前技术水平下，畜牧业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仍存在较大优化空间，投入产出要素的冗余问题有待进一步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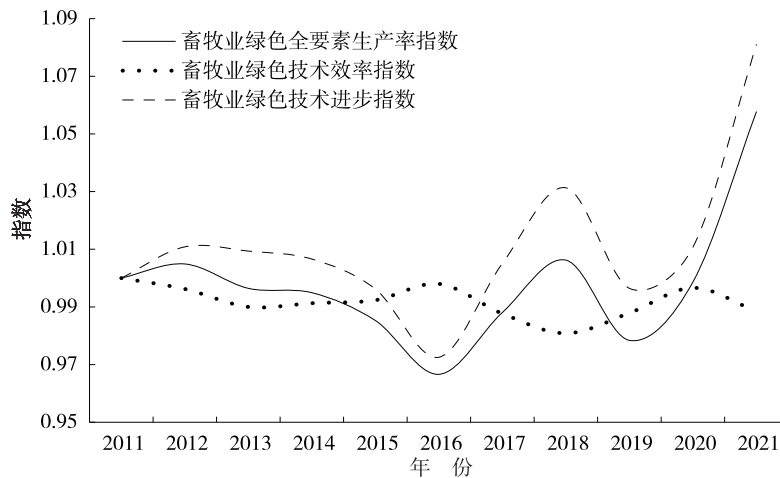


图 2 2011—2021 年中国畜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成分变动对比
数据来源：根据以 2011 年为基期（设定为 1）得到的中国畜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绿色技术效率指数、绿色技术进步指数后续年份的累积性变化绘制而成。畜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项为作者基于产出导向的 EBM-Undesirable 模型和 GML 指数，利用 Matlab2022b 测算。

3 中国畜牧业绿色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中国畜牧业绿色发展迈向新台阶，但其长期稳定发展仍面临一些突出问题。从生产支撑层面来看，畜牧业绿色发展的现代科技创新与应用水平不足，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亟待提升；从资源环境层面来看，饲草资源、水土资源等供应趋紧，减污降碳短期内难以取得明显成效；从利益主体层面来看，受各主体信息不对称、绿色发展意识不足以及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影响，畜牧业全产业链绿色发展任重道远。

3.1 现代科技支撑力度不足，制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

畜牧业绿色发展的关键在于通过绿色科技创新研发、推广与应用，提高养殖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治理效

率, 最终实现畜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然而, 目前中国畜产品生产仍以传统粗放式经营模式为主, 现代科技创新成果在畜牧业领域的应用较少, 限制了畜牧业绿色生产效率提升。一是种质资源保护与新品种开发不足, 部分畜禽品种核心种源自给水平不高, “卡脖子” 风险加大。虽然中国主要畜禽核心种源自给率超过 75%, 但不同类型的畜禽品种的优良种质资源开发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 尤其是奶牛种源自给率低至 25%^[17], 这极大地限制了畜牧业的发展潜力, 增加了畜禽品种在应对疾病和环境变化方面的脆弱性, 影响了畜牧业的可持续性。二是绿色养殖技术创新能力不足, 尤其缺乏成熟的减污降碳技术, 难以实现畜禽污染物有效消纳与低排放。国内新型绿色饲料、新型饲料添加剂、多元化饲料配方技术等开发利用不足, 使得饲料转化效率不高, 反刍动物肠道甲烷排放居高不下^[3]; 此外, 高效粪污资源化利用相关技术在创新与应用层面上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18]。三是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智能装备技术在畜牧业领域起步较晚。利用精准的数据分析和智能化的养殖管理系统, 可以实现更高效的生产, 在降低投入冗余率的同时减少环境污染。然而, 现实中智能科技在畜牧业生产中的应用场景较少, 整体生产信息化和精准化水平较低, 畜禽养殖过程中的资源耗损和污染负荷较大, 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3.2 确保畜产品有效供给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日益尖锐

随着物质消费能力的提升, 中国居民越来越注重饮食健康和营养丰富, 肉蛋奶等高蛋白畜产品的需求量快速增长且态势将长期保持。数据显示, 2022 年中国人均肉类消费量为 34.6 千克, 比 2021 年增长 5.0%, 其中人均牛肉消费量增长 2.9%、人均蛋类消费量增长 2.4%。与此同时, 畜牧业发展对资源环境产生极大的负外部效应。一方面, 资源条件约束趋紧, 直接影响畜产品持续稳定供应。未来一段时期, 中国畜产品消费仍将持续增长, 但玉米等饲料粮供应缺口较大, 特别是能量和蛋白质饲料供需矛盾突出, 大豆、苜蓿等严重依赖国外进口, 大豆进口依存度超过 85%, 饲料粮安全问题已然成为制约畜牧业生产的重要因素; 此外, 养殖用地及饲草料种植用地难等问题突出, 扩大畜牧业生产的土地面积空间极为有限, 严重制约畜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另一方面, 畜牧业体量快速扩大带来更多的环境压力, 减污降碳在短期内难以取得明显成效, 保护与发展的矛盾进一步凸显。虽然政府在大力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种养结合模式, 但当前畜禽养殖还面临粪肥施用方式粗放、粪便养分利用效率低以及种养结合长效运行机制缺乏等问题, 畜禽养殖污染呈总量增加、程度加剧和范围扩大的趋势^[19]; 部分地区生态环境容量饱和, 畜禽粪便排放量远超土地消纳能力, 进一步导致土壤污染。此外, 中国畜牧业温室气体减排形势依然严峻, 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居高不下。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数据统计, 2020 年中国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达 301.56 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占到农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38.2%。

3.3 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 各主体参与内生动力不足

以绿色发展理念贯穿畜牧业全产业链, 加快打造各主体联系紧密、利益分配均衡的畜牧产业链条, 是实现畜牧业绿色转型、保障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义。但当前中国畜牧业产业化缺乏稳定、和谐、有效的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 导致各主体参与动力不足, 制约畜牧业全产业链绿色发展。一方面, 当前中国畜牧业发展中的上游养殖业绩普遍较差, 在全产业链中处于弱势地位。这主要源于面向中小养殖场户的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尚未建立完善, 畜牧业组织化、一体化和信息化程度偏低, 导致畜牧业产加销脱节、联结不紧密、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凸显^[20]。具体而言, 合作社、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的总体经营规模较小且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 提供服务主要停留在基础养殖技术和信息层面, 产业链其他利益主体的参与程度较低, 带动养殖户增收能力有限。虽然生猪养殖业产业化发展势头良好, 但肉牛肉羊产业化程度普遍偏低^[21]。另一方面, 种植养殖主体、加工运输主体与绿色技术服务主体、消费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导致畜牧产品生产过程中绿色技术的供需错位; 加上种植、养殖、屠宰、加工、物流运输到消费等环节缺乏有效的质量安全监管机制, 畜牧业全链条产品质量控制压力加剧, 全链条环境污染物无法有效治理, 难以实现畜牧业全链条经济与环保的双重目标。

4 典型国家和地区畜牧业绿色发展的经验借鉴

各国所面临的资源禀赋差异较大，但是历史上欧盟、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也曾因盲目追求产量而导致畜禽粪便污染严重、碳排放过高等环境问题，此后通过政策、科技、资金等多方面支持，逐渐推进本国畜牧业绿色循环发展。立足中国畜牧业绿色发展的现实基础，结合产业绿色发展的基本规律，从空间维度借鉴国际上典型国家和地区畜牧业绿色发展的经验事实，能够为中国畜牧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借鉴价值。

4.1 欧盟经验

4.1.1 加强顶层设计，健全畜牧业绿色发展政策体系

欧盟在畜牧业绿色发展方面不断强化顶层设计，制定了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早在1962年欧盟出台的《共同农业政策（CAP）》中便提及，通过环保补贴、鼓励农民采取轮作等环保措施保持永久草地，为畜牧业绿色发展提供充足的天然优质饲草。2020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从农场到餐桌战略》，力求从供给侧和需求侧降低种养、加工、储存、运输、包装、消费等供应链各环节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减少畜牧业产业碳足迹^[21]。其成员国荷兰在制度设计方面侧重于资源循环利用，为应对畜禽粪便过剩和粪污积压导致的严重环境污染，先后颁布《动物粪便法案》《恶臭气体法案》等政策法规，从养殖结构调整、数量控制、粪便及有害气体排放处理三方面展开调控，并建立畜禽粪便交易市场，对剩余粪便进行统一管理和定向分流，有效提高了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丹麦则从农业税收政策入手，通过对动物饲料中的磷征税，提高商业饲料利用效率，降低生产商业饲料带来的碳排放；此外，还制定全球首个农业碳税政策，拟依照牲畜数量，对牛、羊等反刍动物带来的甲烷排放征收碳税，以促进畜牧业绿色发展。

4.1.2 重视科研投入，多主体共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为促进畜牧业绿色发展，欧盟建立了政研深度交叉的联合工作机制，以促进缔约方与对应政府机构、世界气象组织等国际组织及科学界密切沟通，共同为缔约方提供畜牧业减排技术、空气污染监测与建模等方面的指导。2018年开始，欧盟通过 SmartAgriHubs 项目，联结农场、科研机构、试验站、推广机构等组织，满足畜牧业、水产养殖等5个农业生产部门的智慧发展需求^[22]。此外，欧盟成员国中，丹麦在优质种源收集、品种选育等方面坚持多主体协作，在粮食、农业、渔业部门的资金支持下，由畜禽繁育委员会与农业研究所、高校、育种公司、扩繁场等专业机构合作，通过基因组选择、生产性能测定和重要性状挖掘等措施，建立了完善的育种体系，培育出大量抗病、高产的畜禽品种；荷兰依托卫星遥感数据与传感技术构建了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系统（NIR），对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进行实时跟踪。

4.1.3 提高动物福利，营造绿色健康养殖环境

欧盟注重通过营造良好的动物福利环境，推动畜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20世纪末《欧洲有机法案》中对理想的畜禽饲养密度、动物源经济肥料、有机饲料的使用等做出了明确规定，避免了超密度饲养带来的动物健康问题和草地过载、水源负担等，有利于保持养殖环境的可持续性。此外，欧盟已于2012年全面禁止笼养鸡，并宣布将于2027年前在成员国范围内逐步淘汰笼养系统，对保障畜禽的自然活动空间、减少疾病发生率、提高饲料转化率、降低污染排放具有积极作用。同时，减少兽用抗生素使用，以降低应激水平，增强动物机体免疫机能，在提高动物生理福利的同时减少环境污染，进而提高畜牧业绿色发展水平。欧洲药品管理局2020年发布的公告指出，欧洲各国的兽用抗生素使用量相较2011年降低了43%，为动物福利保障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4.2 美国经验

4.2.1 以立法为基础，优化畜牧业绿色发展政策布局

美国作为畜牧业生产大国，依靠各类畜牧产品高质量、高效率生产牢牢占据世界畜牧业发展前端。同

时,正确处理畜牧业生态环境污染问题也成为美国立法规制和政府计划的首要方向。美国 2014 年《农业法案》明确指出,通过提供补贴、保险和技术支持等方式,鼓励养殖户采用更加环保的养殖技术和建设养殖场污染治理设施;并授权继续实施“环境质量激励项目”,将其中 60%左右的补贴资金用于治理畜禽养殖污染。《清洁水法》则对畜牧业的废水排放进行了严格规定,要求养殖场采取措施,防止畜禽粪便、尿液和其他废物进入水体,从而保护水资源免受污染。在立法基础上,美国政府相继出台了《应对气候危机行动计划》《美国农业创新战略》《气候适应与恢复行动计划》等环境改良专项计划,重新规划了畜牧业绿色发展行为主体责任,合理利用相关政策工具与服务支持,从整体上优化畜牧业绿色发展布局。

4.2.2 加强科技研发与创新,推动畜牧业环境改善智能化

为实现畜牧业生态友好发展的核心目标,美国显著增加科研投入力度,全面部署科技研发与技术创新体系。一方面,利用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在奶牛等牲畜体内微生物群落中建立精确的微生物组基因编辑系统,改变了其肠道微生物群的代谢,以基因重塑调节瘤胃微生物生态系统的潜力;另一方面,通过海藻识别抗反刍动物消化产生甲烷特性的天然化合物,并配备应用技术将其复制添加至牲畜饲料中,旨在通过饲料改良改变牲畜肠道菌群,以减少畜牧业甲烷排放。在畜禽废弃物管理上,利用容量充足的厌氧塘处理粪污,通过冲洗、刮除频繁收集粪污,应用智能净化设施处理氨气,改良创新畜牧业氨减排技术。除此以外,美国农业部与相关大学共同开发了牧场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计量与汇报系统,可以对牧场整个生产流程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全面评估,进而指导农场主优化生产管理措施,以提升生产效能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6]。

4.2.3 打造畜牧业全产业链融合模式,实现高效生态养殖

构建畜牧业产业体系,实现全产业链的一体化经营能够显著提升畜牧业整体效率,助力畜牧业绿色发展。一方面,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经营模式是畜禽粪污消纳和环境污染治理的最有效的产业化生产方式^[23]。以美国印第安纳州费尔奥克斯农场为代表的大农场,通过新技术渗透融合、产业内部重组整合以及产业间的延伸融合,完成了种植作物饲料化与养殖废弃物肥料化的循环转化,同时,将农场粪肥转化为压缩天然气,为农场机械和运输车辆提供了能源^[24]。另一方面,健全和延长畜牧业产业链,可以充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在市场分工不断深化下,美国畜牧业企业经营的专业化水平也不断提高,建立饲料加工、乳品加工、排泄物处理等加工厂;开展牛奶场、猪场及农作物探险等教育娱乐相结合的农业体验和休闲观光活动,逐步实现产业横向合并和纵向延伸发展,促进畜牧业全产业链绿色发展^[25]。

4.3 日韩经验

4.3.1 坚持制度先行,为畜牧业绿色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日本、韩国等亚洲发达国家十分注重运用政策工具构建制度体系高质量推动畜牧业绿色发展。日本政府在畜禽养殖领域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碳减排,相继出台了《废弃物处理法》《水污染防治法》《恶臭防止法》《肥料取缔法》等一系列严格的法律规范,在家畜粪便管理、养殖场污水排放、畜禽腐臭气体污染浓度限制、家禽排泄物肥料化质量等方面严格规范,有效控制了畜牧业环境污染。韩国政府侧重通过推广家畜粪尿处理支援事业、山地生态畜产农场建设项目等政策项目,引导养殖户、环境部门和高校科研院所等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和协同合作。同时,配以《畜产法》《畜禽粪尿管理和使用法》《农渔村发展特别措施法》等相关法律监督和保障,遴选符合绿色发展许可的畜牧业经营主体资质,规定企业、畜牧业者相关责任主体的履行职责,以充分发挥政府在畜牧业绿色发展中的监督、引导和润滑作用。

4.3.2 结合地域特色,打造循环畜牧业模式

日本、韩国土地资源相对紧缺,可用于牧草种植的耕地更为稀缺。为应对这一挑战,日本政府发挥森林资源优势,利用废弃或难以耕种的森林区域来减少牧草种植对传统耕地的依赖。这种森林牧场模式还将牲畜粪便作为肥料促进森林植物生长,维持森林生态系统平衡,实现粪污循环利用。此外,多样化的森林饲草能有效减少牲畜肠道的甲烷排放,且森林植被有助于增强土壤固碳能力,进而有助于减缓全球变暖。韩国政府

通过资金补贴、技术指导等方式，鼓励符合条件的农场实施“耕畜循环”农业，即通过厌氧发酵等技术将畜禽粪尿转化为沼液或有机肥等资源，以减少化肥投入；并将农副产品转化为饲料，在提高农副产品附加值的同时确保了畜禽饲料的稳定供应，延伸了农副产品加工链，形成了“畜—沼—果”“畜—沼—鱼”等多元化循环发展模式，有效降低了畜禽粪尿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

4.3.3 依托协会组织，推动绿色养殖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日本畜牧业服务体系发达，拥有畜牧振兴事业团、中央畜牧会等 30 多个全国畜牧业生产合作组织，其服务范围覆盖了日本大多数地区。日本依托发达的互助合作组织和行业协作组织，完善畜禽产品质量认证系统，研发改善氨基酸平衡的饲草料，培育低甲烷排放畜种，推广绿色低碳养殖模式与先进养殖技术、管理经验，有效促进了畜牧业绿色低碳技术的落地。韩国畜牧业协会组织同样在推动畜牧业绿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 2020 年，韩国农业协会联盟（NACF）中已成立 116 个地区畜牧业合作社、23 个畜牧业商品合作社。农、畜协会通过运营畜粪联合资源循环利用设施，主导种植户与养殖户合作，建立资源循环农业园区，提高畜禽粪污的种植业消纳量，有效推动了畜牧业绿色发展。

4.4 经验对比

上述国家和地区在推进畜牧业绿色发展工作中，均立足本国国情，基于人地资源条件、养殖特征、发展阶段等因素，形成了因地制宜的畜牧业绿色发展方案，其中既体现出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产业绿色转型过程中的共性特征，又包含一些独具特色的经验做法（表 1）。

表 1 典型国家和地区畜牧业绿色发展经验对比

维度	欧盟	美国	日本、韩国
人地资源	人口集中，幅员辽阔	人口稀少，土地广阔	人口众多，土地稀缺
养殖特征	依托气候地形科技优势，适度规模经营，现代化程度高	与种植业紧密联系，大规模工厂化养殖，集约化生产水平高	散养场户数持续减少，规模适度扩大、优势区域集中度持续提高
发展阶段	低碳绿色养殖	科技智慧养殖	生态高效养殖
发展方向	注重动物福利，提升畜牧养殖质量	注重科技创新与推广，推动畜牧业环境改善智能化	注重资源循环利用，发挥畜牧业服务体系优势
共性做法	政策体系		
	科技体系		
特色做法	注重提高动物福利，改善畜禽养殖环境，降低畜禽疾病发生率，减少环境污染	通过农牧循环内部融合和延伸产业链等多重模式，促进畜牧业全产业链绿色发展	依托森林牧场养殖优势，降低对稀缺资源的依赖，形成区域特色绿色养殖模式

通过对比分析，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可总结为以下四点。第一，构建系统完整的畜牧业绿色发展计划。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畜牧业绿色发展方面起步较早，通过建立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有效的财政补贴政策、税收限制政策、技术支持政策，促进畜牧业减污降碳及畜禽粪污资源化循环利用，真正实现“以法治牧”。第二，注重科技创新与推广体系全域构建。科技创新研发和推广体系的全覆盖是推动畜牧业绿色发展关键路径。美国等畜牧业发达国家经过长时间转型升级，大规模、一体式、专业化生产已在其畜牧行业中占主导地位，通过大量的科研投资和构建高效的技术推广体系，以确保绿色养殖技术的快速普及和应用。第三，重视畜牧业全产业链紧密融合。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种养循环等农业内部融合以及延伸畜牧业产业

链等模式，形成了相互支撑、互惠互利的生态循环系统，在促进畜禽粪污消纳和环境治理的同时，有效提高了产业链各环节的资源利用效率，助力畜牧业全产业链绿色转型。第四，倡导多元主体协同推进畜牧业绿色发展。典型国家和地区的实践表明，在政策制定、组织管理等过程中，强化政府、科研机构、民间组织、企业和消费者等主体间的协同合作，有利于整合各领域资源及优势，促使资源、技术、经验共享，在满足各主体利益的同时增强畜牧业绿色发展韧性。

5 高质量发展任务背景下中国畜牧业绿色发展的路径指向

实现畜牧业绿色转型，既要参考国际农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共通经验，也要立足国情农情体现中国特色。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为促进畜牧业绿色发展，必须深度挖掘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双重引擎的潜力，构建多主体协同互动的畜牧业绿色发展框架，探索畜牧业向高端化转型、生态化演进、可持续化发展的产业升级路径，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和谐统一。

5.1 科技驱动：强化绿色科技创新及推广应用

科技驱动是畜牧业绿色发展的核心引擎，引领行业经济实现健康稳健增长，同步推动畜牧业绿色转型。一是加快畜牧业绿色科技研发。聚焦废弃物资源化、资源节约新品种培育及病死畜禽环保处理等绿色养殖技术重点领域，推进现有养殖技术精细化改良、系统性优化与前沿创新研发，力求开发出高效、低污、节能的技术与设备。同时，融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研发智能环控系统、疾病预警系统等智能养殖设施，提高养殖效率和生产安全，减少资源浪费，实现养殖过程的智能化管理。二是强化绿色养殖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应定期组织畜牧企业和养殖场户参加绿色养殖技术培训，提高绿色养殖科技素养和实际操作能力，在畜牧发展重点区域，构建科技示范基地，直观展示先进绿色养殖技术、管理模式及环保技术，促进技术辐射与扩散，带动当地畜牧企业和周边养殖场户技术升级。同时，完善绿色养殖技术咨询体系，通过在线服务平台、技术支持热线等方式提供绿色养殖技术的选择、评估、实施等方面的咨询，为畜牧业绿色创新发展提供全方位智力支持。

5.2 制度引领：完善畜牧业绿色发展制度体系

制度建设在引领畜牧业绿色转型中占据核心先导地位。为挖掘畜牧业绿色发展潜力，要结合区域定位、因地制宜设计政策，农区牧区各有侧重，构建科学有效的畜牧业绿色发展制度体系。一是推进农区畜牧业绿色转型，核心在于增效减污。应建立养殖用地规划制度，合理规划养殖用地，推动畜禽养殖与农业种植有机结合，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同时建立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管理制度，设定严格粪污处理标准，确保养殖场环保设施齐全，减少污染排放。辅以财政激励与税收优惠，引导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升级，双轮驱动提升生产效率与环保绩效。二是牧区畜牧业绿色转型注重草原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力求资源永续利用。应科学核定草原载畜量，制定休牧轮牧禁牧制度，实行草畜平衡管理，减少过度放牧对草原生态的破坏。同时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激励牧民履行草畜平衡责任，增强生态保护动力。三是农牧交错带畜牧业绿色转型，致力于农牧业协同进化，应建立农牧结合发展制度，促进农牧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生态环境双重保护，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5.3 产业融合：推动畜牧业全产业链一体化经营

产业融合发展作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深刻影响着畜牧业产业内部的协作模式和产业链的组织形式，最终促成畜牧业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推动畜牧业全产业链一体化经营，一是加快内部融合，以发展绿色循环养殖模式为核心，采用农林结合、种养结合、农牧结合等生态循环方式，促进畜牧业与种植

业、林果业、渔业等多元产业的深度融合。如通过“猪—沼—果(菜)”等模式,促进畜禽粪便到有机肥料的高效转化,优化资源配置,减少化肥依赖及环境污染,同时促进秸秆等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构建闭环生态链,进一步提升土地综合效益。二是延伸产业链模式,聚焦畜牧产品价值链的增值与重塑,促进畜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通过规模化、标准化的绿色供应链管理,确保饲料采购、养殖过程、屠宰加工到销售各环节的环境友好与可持续性。深化与肉类加工企业的战略联盟,引入高端加工技术,延长产品保质期,通过即食、半成品等创新产品形态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显著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将屠宰副产物转化为饲料添加剂与生物肥料等高值化产品,促进废弃物资源化,减轻环境负担。此外,与餐饮业、旅游业跨界合作,拓宽畜牧产品的销售路径,并通过品牌塑造与文化营销,增强市场辨识度与消费者忠诚度,为畜牧业绿色循环发展注入新鲜活力。

5.4 主体协同:构建多主体参与治理的绿色发展格局

多主体协同是推进中国畜牧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需要明确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各方的角色,构建多主体参与的畜牧业绿色发展格局。一是政府作用。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治理责任在于草原生态保护与恢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纯公共物品上。政府主体应发挥主导作用,通过立法手段确立保护规范,同时利用财政资金支持畜牧绿色项目的实施与监督,确保纯公共物品得到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二是市场作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在有机肉类、绿色乳制品等私人物品生产与分配中占据核心地位。市场主体需整合全产业链,优化资源配置,利用价格机制激励绿色生产,通过市场溢价等手段促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经济双赢。三是社会主体作用。社会主体在畜牧业绿色发展中作用显著,特别是水源保护、草地管理等俱乐部产品领域,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社会主体需承担具体治理责任。构建受益者付费机制,鼓励社会主体积极参与畜牧业绿色转型,促进资金汇聚与资源永续利用。此外,社会主体还应积极参与绿色养殖实践,依托技术创新与模式革新,驱动推动畜牧业向更加环保、高效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 [1] 农业农村部.“十四五”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规划[R].北京:农业农村部,2021.
- [2] 李军,潘丽莎.乡村振兴背景下畜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与破解路径[J].经济纵横,2022(8):58-64.
- [3] 贾云飞,郑伟程,何泽军,等.我国畜牧业绿色发展:现状、制约与战略应对[J].中国畜牧杂志,2023,59(1):323-329.
- [4] 杨义风,王桂霞.中国畜牧业政策演进逻辑与改革方向[J].社会科学战线,2020(3):248-252.
- [5] DU R, HE T, KHAN A, et al. Carbon emissions changes of animal husbandry in China: trends, attributions, and solutions: a spatial shift-share analysis [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24, 929: 172490.
- [6] 励汀郁,王明利.畜牧业助力“双碳”目标实现路径研究:基于不同国家的经验比较与启示[J].世界农业,2023(1):5-16.
- [7] 何可,李凡略,刘颖.“双碳”目标下的畜禽养殖业绿色发展[J].环境保护,2022,50(16):28-33.
- [8] 张朝辉,姬一帆,何泽军.中国省域畜牧业绿色发展竞争力时空演变特征[J].中国农业科技导报,2022,24(9):12-23.
- [9] KUHN L, BALEZENTIS T, HOU L, et al. Technical and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of livestock farms in China: a slacks-based DEA approach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0, 62: 101213.
- [10] 刘浩,彭华,余泽田,等.规模化奶牛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采纳及其经济效应评价[J].资源科学,2023,45(8):1560-1576.
- [11] 王如玉,肖海峰.种养结合能否提升肉羊养殖环境技术效率?:基于不同种养结合模式的MTE模型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24,29(3):260-273.
- [12] 朱月红.乡村振兴背景下生态畜牧业绿色发展路径研究[J].中国饲料,2023(16):166-169.
- [13] 邵光学.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畜牧业绿色发展的时代价值、现实基础与完善路径[J].饲料工业,2024,45(6):

- 130-133.
- [14] 郭世娟, 胡铁华, 胡向东, 等. “粮改饲”补贴政策该何去何从: 基于试点区肉牛养殖户的微观模拟 [J]. 农业经济问题, 2020 (9): 101-110.
- [15] 金书秦, 韩冬梅, 吴娜伟. 中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政策评估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8 (3): 119-126.
- [16] 易青, 李秉龙, 耿宁. 基于环境修正的中国畜牧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 24 (S3): 121-125.
- [17] 宋燕平, 范祥祺, 王欣. 中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优化 [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22, 41 (3): 87-95.
- [18] 陈秋红, 张宽. 新中国 70 年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演进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0, 30 (6): 166-176.
- [19] 董红敏, 左玲玲, 魏莎, 等. 建立畜禽废弃物养分管理制度 促进种养结合绿色发展 [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9, 34 (2): 180-189.
- [20] 陈伟生, 关龙, 黄瑞林, 等. 论我国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9, 34 (2): 135-144.
- [21] 王明利.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畜牧业发展: 成就、经验及未来趋势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8 (8): 60-70.
- [22] 唐博文. 从国际经验看中国农业温室气体减排路径 [J]. 世界农业, 2022 (3): 18-24.
- [23] 袁祥州, 黄恩临. 欧盟智慧农业发展经验及其借鉴 [J]. 世界农业, 2022 (5): 27-36.
- [24] 张斌, 金书秦. 荷兰农业绿色转型经验与政策启示 [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0, 41 (5): 1-7.
- [25] 胡伟斌, 黄祖辉. 畜牧业三次产业融合: 基于美国典型案例的研究及启示 [J]. 中国畜牧杂志, 2018, 54 (10): 125-129.

Realistic Basis, International Lessons, and Pathways for Green Development in Animal Husbandry in the Contex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asks

ZHAO Minjuan DU Ruirui

Abstract: Green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four key tasks of green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systematically elaborating on the current achievements of green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in China. These achievement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phased effectiveness of the utilization of manure resources, the steady promotion of the agricultural-animal husbandry circular development mechanism, the continuous enhancement of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synergy, and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facing challenges such as relatively lagg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tightening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nd insufficient motivation of all participants. Based on the practical problems, this paper further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ypical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the European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green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It proposes that developing a systematic green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issemination, accelerating the close integration of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encouraging multi-subject participation all hold valuable lessons for China.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 background and goal of China's animal husbandr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green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in China from technology, institution, industry, subject construction four aspects.

Keywords: Animal Husbandry; Green Development; Realistic Basi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mplementation Path

(责任编辑 卫晋津 张雪娇)

县域涉农富民产业形成机理、 培育困境及破解路径

——基于产业链一体化的视角

◆ 庄天慧 邱峰

(四川农业大学西部乡村振兴研究中心 成都 611100)

摘要: 发展县域涉农富民产业是农民增收致富的关键路径。本文分析了县域涉农富民产业的形成机理、培育困境和破解路径。研究认为, 县域涉农富民产业形成、壮大的核心要件是产业链一体化。其在不同发展阶段, 通过乡村产业带头人的带动、链主企业的引领和数字平台的赋能, 促进产业链的横向、纵向以及混合一体化, 进而实现要素融合、规模扩张和产业跃迁, 在产业兴旺中实现产业富民。当前, 部分地区培育县域涉农富民产业仍然面临主体培育不足、平台支撑薄弱的限制。应瞄准产业链主体和平台关键“短板”协同发力, 在关键技术转化、优化县域营商环境方面做好配套服务。

关键词: 县域富民产业; 产业链一体化; 形成机理

DOI: 10.13856/j.cn11-1097/s.2024.12.002

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比较优势明显、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县域富民产业”^①。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 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县域富民产业涉及农业、工业、服务业, 其中, 县域涉农富民产业以农业为基础向第二、第三产业延伸, 是县域富民产业的主要类型、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载体。一方面, 县域一头连着城、一头带着乡, 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 也是推进产业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目前, 中国产业分布较大一部分仍集中在县域, 2022—2023年工信部公布的两批次200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中, 县(市)拥有81家, 占比达40.5%^②, 在县域层面培育富民产业有利于农民就近就业、创业。另一方面, 涉农的富民产业依托农业生产资料, 延长既有产业链、价值链, 天

收稿日期: 2024-01-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县域富民产业促进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农村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对策研究”(23AJY015), 四川农业大学西部乡村振兴研究中心2023年项目“城乡融合背景下四川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研究”(WRR202317)。

作者简介: 庄天慧(1964—), 女, 四川彭州人, 教授, 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

通信作者: 邱峰(1998—), 男, 四川德阳人,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县域产业发展与共同富裕, E-mail: qiu feng090598@163.com。

① 参见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12月23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3-03/15/c_1129432282.htm。

② 详见工业和信息化部《2022年度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2023年度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

然具有较强联农带农优势,有助于改善农民收入结构、提高增收稳定性。总体来看,发展县域涉农富民产业,既是当前乡村全面振兴的迫切需求,更是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县域涉农富民产业立足县域特色农业禀赋资源,产业集群特征突出,劳动力使用密集,联农带农能力强,具有突出“特色”与“富民”特征^[1]。县域涉农富民产业主要包括特色种养业、涉农加工业、涉农服务业、涉农新业态等。与传统模式下县域产业强调“效率”不同,县域涉农富民产业更强调就业、增收的“包容性”,并将产业发展的场域由乡村拓展至县域全境,将产业发展的终极目标由“产业兴旺”转向“产业富民”^[2]。与县域非涉农富民产业相比,县域涉农富民产业与农民增收关联更紧密,涉及农户收入结构更多样化,影响范围更广,是县域富民产业中特别值得关注的产业类型。

学术界对县域涉农富民产业的关注,较早可追溯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兴起的乡村产业富民模式实践^[3]。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县域涉农富民产业的内涵、增收效果、作用机制和对策层面。在增收效果层面,已有研究认为县域涉农富民产业具有增收效应,其增收效应会随着产业模式、群体差异^[4]、区域差异^[5]而呈现出异质性。在作用机制层面,从个体的增收途径来看,能够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6]、增加就业机会等方式,提高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7]。在对策层面,已有研究认为县域涉农富民产业的发展面临着如“重产业发展轻帮扶”“弱者吸纳”等实际困境^[8]。因此,应顾及中低收入群体强化特色产业政策、优化涉农资金使用政策^[9],让农户主动适应产业结构变化^[10],强化农户集体合作能力,进而促进农村共同富裕^[11]。

产业链一体化是分析县域涉农富民产业形成的重要视角。产业链一体化是产业链各主体通过整合资源、协同合作,对产业规模、布局、分工和结构进行广泛联动的过程^[12]。涉农产业的产业链一体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广大农户为基础、以科技服务为手段,通过将涉农产业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13]。从产业链一体化角度分析县域涉农富民产业的形成有两方面的突出价值。一方面,县域涉农富民产业的形成涉及多环节、多主体,产业链一体化视角能动态反映从单环节、单主体到多环节、多主体生产衔接和价值传导的全过程,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另一方面,县域涉农富民产业形成的独特标志是“富农民”,产业链一体化视角能充分反映农户主体的联合、参与及受益变化过程,契合该产业的价值目标。总体而言,产业链一体化的视角能有效分析县域涉农富民产业的形成,有必要跟进开展研究。

纵观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县域涉农富民产业的概念内涵、增收效果等方面,对县域涉农富民产业的形成探讨较少,尤其从产业链一体化视角开展分析还较缺乏。基于此,本文基于产业链一体化视角,立足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厘清县域涉农富民产业的内在互作规律,阐明县域涉农富民产业存在困境的底层逻辑。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回应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之需,在产业空间层面突破乡村范围,以“跳出”乡村促增收的思路开展研究,在县域产业组织层面围绕价值传导开展分析,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2 县域涉农富民产业的形成:基于产业链一体化视角

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产业链整合是将分散在不同环节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整合在一起的过程。产业链整合可细分为产业链横向、纵向和混合一体化。其中,横向、纵向一体化分别指产业链同一、不同环节上经营主体之间发生的关联。产业链混合一体化指全产业链中若干生产经营单位实行跨产业经营,并通过多种利益联结形成共生关系,进而达到减少交易费用、规避经营风险的产业链整合过程^[14-15]。相较于单一的横向、纵向一体化,产业链混合一体化更具有兼顾“发展效率”与“社会效益”的特征。

县域涉农富民产业的形成过程,既涉及产业链纵向各环节的衔接、传导,也涉及横向各主体的联合、互动。在县域涉农富民产业还不成熟的时期,往往是单一的产业链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虽能在一定程度上让农民分享少部分产业链整合价值^[14],但并不充分。在较为成熟的时期,产业链混合一体化则能集横向、纵向一体化之所长,不仅能够改变经营主体间的契约关系,还能激励技术创新、实现产业链增值^[15-16]。从单

一的产业链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转向产业链混合一体化过程中,产业效益得以提高,产业利益联结机制得以完善、产业富民得以充分实现。

基于产业组织理论,本文认为县域涉农富民产业形成的核心机理是: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适应性的产业链整合策略,通过产业链整合促进要素融合、规模扩张和产业跃迁,进而在产业兴旺中实现产业富民(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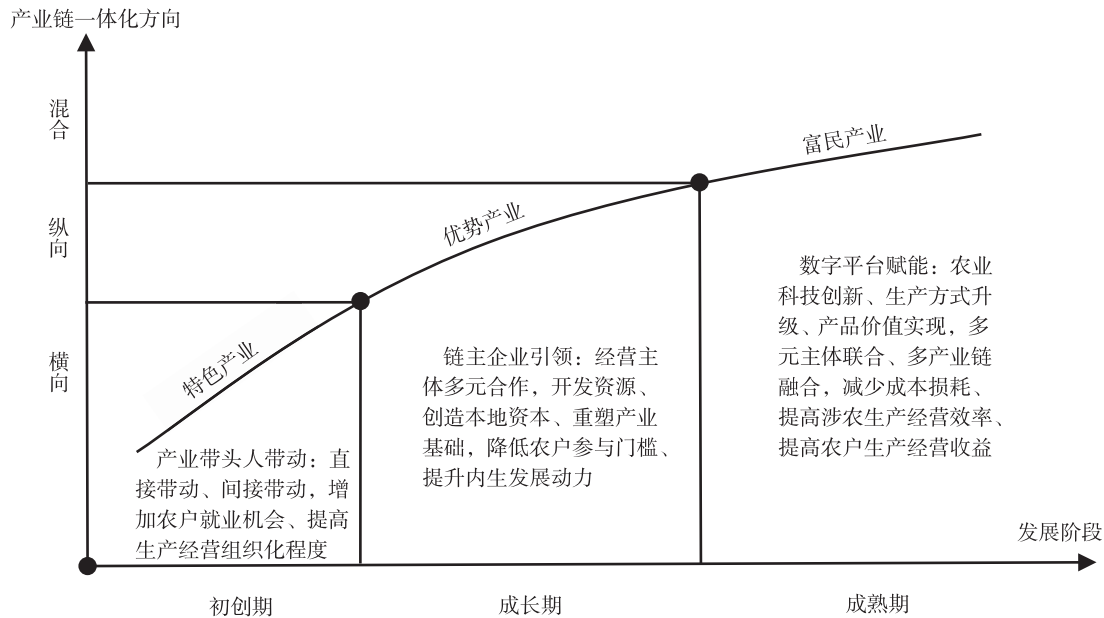


图1 县域涉农富民产业形成机理示意图

具体而言,在县域涉农富民产业的初创期,通过发挥乡村能人的示范效应、头雁效应组织普通农户开展“横向联合”,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形成联农带农的产业组织雏形,并在乡村腹地形成小有规模的特色产业;在成长期,通过链主企业的引领,实现对产业链上下游发展资源、产业组织基础的重塑,并在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本深度嵌合的过程中不断创造本地产业资本,在县域范围内形成禀赋优势明显的产业集群;在成熟期,依托数字平台等新载体实现主体和功能更加丰富、产业类型多样的全产业链融合,最终形成产业空间多维交融、竞争优势突出、联农带农效果良好、发展前景广阔的富民产业。

2.1 初创期：产业带头人带动的横向一体化

县域涉农富民产业发源于乡村腹地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在产业发展的初创期,涉农产业在乡村地区呈现出自给自足或分散经营的特点。这一时期的涉农产业本质上仍旧是小农生产经营模式,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利润薄,难以与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市场需求相适应。此时,由乡村产业带头人^①带动的涉农生产经营“横向联合”是涉农产业由传统小农生产经营转向产业化发展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这种联合关系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带头人所发挥的示范效应、头雁效应。

带头人对普通农户的带动分为直接带动和间接带动。其中,直接带动即带头人通过生产技术溢出、机器设备租赁、劳务雇工、共创品牌等多种形式帮助普通农户开展涉农生产经营项目。带头人作为乡村精英的代表,通常具备较强的市场经营能力、相对雄厚的经济实力、敏锐的洞察力及较高的社会威望,不仅能够识别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潜力与机会,更能够有效承接外部项目,并起到积极的组织动员和整合群众的作用。这

^① 产业带头人即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相适应,能够引领一方、带动一片的乡村主导产业带头人^[17],其既包括返乡大学生、能人、农民工、入乡企业家,又包括种养精英、家庭农场主、贩销大户、村组干部等。

有利于整合乡村涉农资源、确定本土特色产业，并引导涉农产业向产业化经营方向发展。间接带动即带头人通过领办合作社等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带领普通农户发展合作经营项目。能人领办合作社更容易在合作社内部形成集体行动、降低组织费用，并提高合作社运行效率^[18-20]。相较一般性合作社，能人带动型合作社负责人市场能力突出，更容易获得政策支持，这些因素都有助于合作社功能的实现^[21]，从而促进涉农产业实现规模经济。

在县域涉农富民产业发展的初创期，由产业带头人带动的横向一体化不仅带动了农户发展优势产业、增加了农户就近就业机会和收入，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户开展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激发了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积极性与信心，为后续多主体参与及延长产业链提供了前期基础。

2.2 成长期：链主企业引领的纵向一体化

随着县域涉农富民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原有能人带动的横向一体化模式的比较收益逐渐降低，不利于产业创新以及获得更大的市场竞争力。不仅如此，乡村地区社会化服务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生产技术落后、资金欠缺、市场规模小等固有劣势将导致多数涉农产业遭遇发展瓶颈。在这一时期，县域涉农富民产业迫切需要“跳出”乡村谋发展，利用县城地区、区域先发地区的资本优势对原有发展资源进行深层次开发、对产业组织基础进行整体性重塑，从而为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此时，产业链上游生产经营主体与中下游涉农链主企业^①间进行的“纵向延伸”是县域涉农富民产业在成长期的主要发展路径。

在实践中，链主企业不仅要通过基地生产、订单农业、“反租倒包”、土地入股、利润分红等方式与上游经营主体展开合作，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当地特色资源进行精准化招商引资，畅通涉农产业链的资金链，并以资金链的畅通推动创新链的优化和价值链的增值^[23]。一方面，在链主企业的引领下，逐渐形成产业链完备、配套支持企业集聚、基础设施完善、产业功能多元化、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产业效益持续提高的现代化涉农产业；另一方面，产业链上游经营主体将立足本地资源、兼收外部资本的合理成分，利用外部资本将本地资源转化为“留得住”的本地产业资本，提升乡村、农户的内生发展动力。例如，将外部资本引入本地文化和劳动力的开发利用中，促进虚拟文化价值转换为客观经济收益和乡村精英的不断成长，进而形成能够持续投入产业再生产过程的本地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发挥链主企业的产业服务功能尤为重要。

在县域涉农富民产业发展的成长期，由链主企业引领的纵向一体化不能盲目要求农业退出乡村、乡村向城镇看齐，更不是外来工商资本垄断生产资料、排挤甚至侵占农户利益的“企业控制产业”^[24]式发展。这一时期，县域涉农富民产业的纵向一体化应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基本原则，以降低农户参与产业发展、分享产业增值收益的门槛，提升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为目标，在上下游经营主体激励相容、互利共赢中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2.3 成熟期：数字平台赋能的混合一体化

经过初创期的横向一体化和成长期的纵向一体化，县域涉农富民产业已然将发展空间由乡村腹地拓展至县域全境，其基本具备了联农带农组织雏形，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产业发展瓶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获得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然而，传统涉农产业发展中信息不对称、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次优、产销脱节等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涉农产业链各个环节都需要新的介质来赋能产业跃迁。数字赋能可以颠覆传统生产经营与服务体系，有助于实现农业发展的重大创新^[25]。此时，涉农产业链经营主体围绕数字平台（平台农业）所进行的产业组织重构是县域涉农富民产业在成熟期的主要一体化模式。

实践中，县域涉农富民产业依托涉农电子商务平台、现代农业创新服务平台、现代农业产业链服务平

① 链主企业即在现代产业链供应链组织结构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核心企业^[22]。

台、复合型涉农服务平台等数字平台^[26]，实现涉农产业链的跨领域整合。平台以各类涉农产、供、销以及科教数据信息为支撑，赋能涉农产业链产前环节的农业科技创新、产中环节的生产方式升级及产后环节的产品价值实现^[27]，并推动县域涉农富民产业实现更深层次的产业融合。一方面，依托数字平台去中心化、去中介化^①的特征，推动涉农产业链上、下游生产经营主体（包括普通农户、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涉农企业等）实现高效联合，并将各类科研机构、农技推广机构、社会服务组织乃至消费者等市场参与者纳入联合的主体范畴；另一方面，利用数字平台在资源优化、要素流通、市场连接等方面的优势，在县域范围内持续推动“一产往后延、二产两头连、三产走高端”，打造生产、加工、储运、销售、品牌、体验、消费、服务等环节紧密关联、有效衔接、耦合配套的融合式全产业链^②。

在县域涉农富民产业的成熟期，产业发展空间在数字平台的支撑下逐渐突破地域空间的限制，实现线上空间与线下空间的深度融合。其产业实体留在县域、产业主体留在乡村，而产品市场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平台化涉农产业发展路径受益于前沿科技力量，更容易满足农户的发展利益。以农业生产经营为例，在生产环节，高效的技术转移和扩散赋能农户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在销售环节，市场大数据能够将各类产品的供给与消费者的需求进行精准匹配，大幅减少信息搜寻成本；在流通环节，线上物流系统缩短产品中间环节，由此节约的流通成本将转化为农户的产品利润；在售后环节，大规模、高频率的消费反馈帮助农户及时调整生产、适应市场供需，既稳定了市场价格，又稳定了农户收入预期。各个环节循环往复，将有助于实现农户更高水平、更可持续的收入增长^[28]。

3 培育县域涉农富民产业面临的现实困境

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和引导下，部分县域已经发展形成一些初具富民产业特征的现代农业^[1-2]，但多数县域培育涉农富民产业仍然受到内外部条件的制约。由前文分析可知，产业主体和支撑平台是县域涉农富民产业在不同发展阶段顺利实现产业资源整合、要素聚集与开发、全产业链优化升级的关键点。目前，中国多数县域仍面临产业带头人培育不足、涉农链主企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数字人才支撑薄弱等现实难题，影响了县域涉农富民产业的培育效果和持续壮大。

3.1 产业带头人培育不足限制涉农产业资源整合

产业带头人是县域涉农富民产业在发展初期实现农民群体“横向联合”的关键发起点。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和引导下，全国产业带头人培育取得一定成效。但从总体上看，县域地区仍然面临产业带头人培育不足的问题。一方面，农村优质劳动力持续外流的趋势难以逆转，本地产业带头人的培育后继乏力。根据《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2年全国外出农民工为17190万人，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8.15%，占农村常住人口的35.01%。特别是，这部分外出农民工往往是农民工群体中综合素质较高的群体。数据显示，在外出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18.7%，平均年龄为37.4岁；而留在本地的农民工中仅有9.1%的文化程度在大专及以上学历，并且平均年龄达到46.8岁^③。另一方面，农村实用人才^④和高素质农民无疑是产业带头人的重要来源，其基数大小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产业带头人的培育数量。从存量上看，2023年全国约有农村实用人才2300万人，与2020年相比增加近80万人，全国累计培育高素质农民800万人^⑤。但农村

① 去中心化即资源供给双方直接进行匹配，去中介化即搜寻与交易成本降低。

② 参见《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农业全产业链培育发展的指导意见》，http://www.moa.gov.cn/nybg/2021/202106/202110/t20211026_6380484.htm。

③ 参见《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④ 农村实用人才即具备一定知识和技术、能够在农村发展中能够起到示范和带头作用、受群众认可的农村劳动者。

⑤ 参见《1.3万亿斤以上，连续9年的丰收答卷》，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2/content_6921069.htm；《全国农村实用人才约2254万人》，https://www.gov.cn/xinwen/2020-11/20/content_5562824.htm。

实用人才和高素质农民数量分别仅占乡村就业人员总数的 8.52% 和 0.29%^①。这表明, 现有的农村实用人才和高素质农民数量还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产业带头人培育。县域产业带头人培育不足不利于“头雁效应”和“示范效应”的发挥, 可能限制新技术、新模式的引入, 导致各类涉农产业资源难以实现最佳配置。这不利于涉农富民产业在发展初期扩大生产规模和突破发展瓶颈。

3.2 涉农链主企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阻碍生产要素集聚与资源开发

涉农链主企业是县域涉农富民产业在成长期顺利实现外部资本引入、内部资源开发以及产业组织基础重塑的“领头羊”。目前, 全国涉农链主企业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涉农链主企业在区域分布上的不平衡。以中国 500 强农业企业为例, 根据 2020—2023 年《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分析报告(一/二)》^[29-32] (以下简称《报告》), 2018—2022 年, 全国 500 强农业企业集中分布在发达的东部地区, 占比高达 47.0%~56.2%; 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区的 500 强农业企业分布较少, 2022 年分别仅有 14.4%、15.2%、14.2% 的 500 强农业企业分布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② (图 2)。这意味着在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 不少县域涉农产业发展可能面临链主企业少甚至无链主企业的困境。二是整体上涉农链主企业的发展层次不高。同样以中国 500 强农业企业为例, 《报告》显示, 尽管 500 强农业企业涉及的经营业务和产品复杂多样, 但仍主要集中在食品加工、粮油生产、饲料生产和畜牧养殖行业 (2022 年四类行业共计占比 61.9%), 2022 年从事特色产业、农业投入品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农业企业仅占 11.5%。这不利于促进资源要素的集聚和开发, 难以延长县域涉农产业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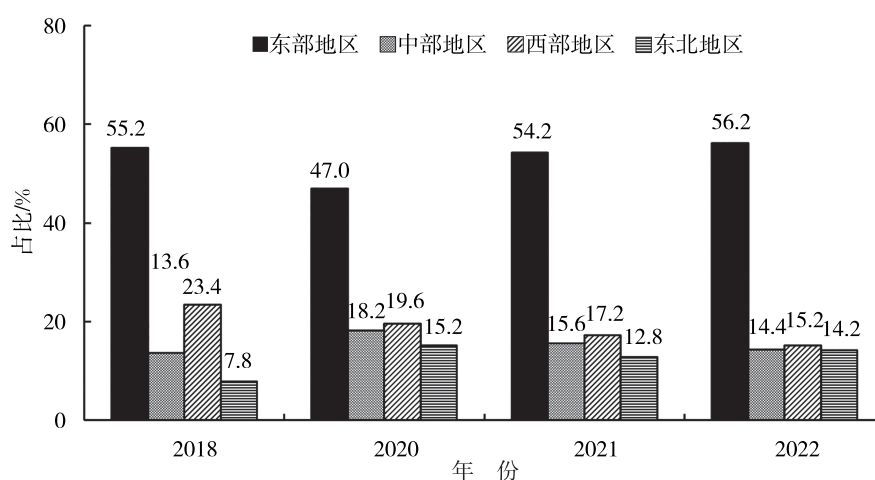


图 2 2018—2022 年分地区中国 500 强农业企业地区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 2020—2023 年《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分析报告(一/二)》。

3.3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数字人才支撑薄弱制约产业链跃迁

数字平台是县域涉农富民产业在成熟期实现产业跃迁的关键支撑。然而, 目前全国多数县域依托数字平台赋能涉农产业链优化升级的基础性条件并不充分, 其主要表现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与数字人才支撑薄弱两方面。第一, 就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而言, 突出的资金供需缺口直接导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根据《2021 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价报告》, 2020 年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的财政投入仅占国家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的 1.4%; 全国分别约有 20.2% 和 31.8% 的县(市、区)基本没有用于农业农村信

^① 乡村就业人员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②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 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息化建设的财政投入和社会资本投入，并且分别约有 25.3% 和 34.3% 的县（市、区）在信息化建设的财政投入和社会资本投入上不足 10 万元。这使得全国县域面向农业生产的 4G 和 5G 网络、遥感卫星、大数据中心等信息基础设施，在研发、制造、推广应用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求^①。第二，就数字人才而言，农村地区居民互联网参与率低、数字素养欠缺将导致县域数字人才支撑薄弱。根据《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3 年 12 月，农村地区非网民占比为 51.8%。其中，因为“不懂电脑/网络”而不上网的非网民占比为 51.6%，因为“不懂拼音等文化程度限制”而不上网的非网民占比为 27.7%。总而言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数字人才支撑薄弱将分别从“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制约农业数字平台在涉农产业链的开发和利用，从而使得县域涉农富民产业难以利用数字技术对全产业链进行优化升级。

4 培育县域涉农富民产业的突破路径

针对部分地区在培育县域涉农富民产业过程中面临的难题，应从纵向协同和横向联结两方面入手，瞄准促进产业链整合、升级的关键主体（产业带头人和链主企业）和应用数字化涉农产业服务平台的“短板”协同发力，并在关键技术转化、优化县域营商环境方面做好配套政策服务（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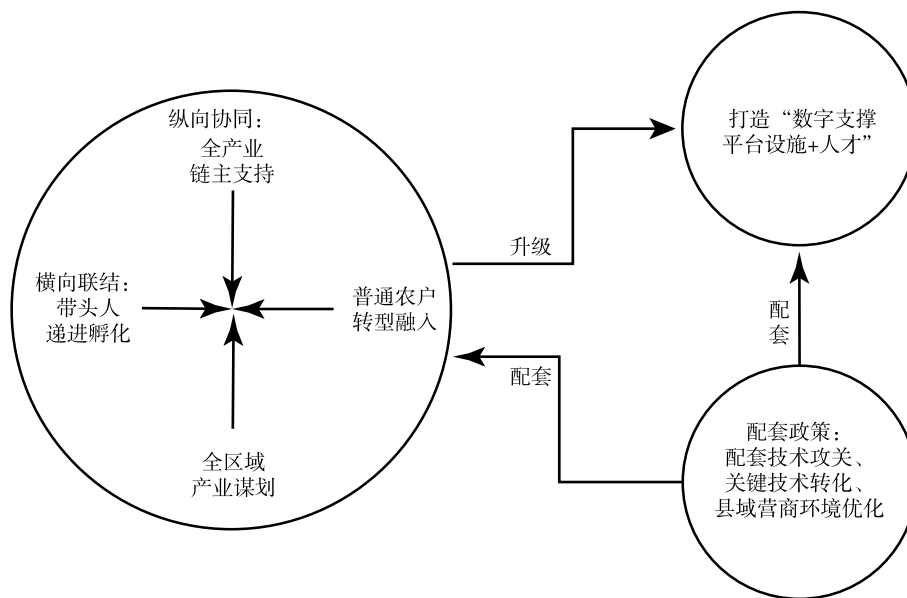


图 3 培育县域涉农富民产业的突破路径示意图

4.1 递进孵化产业发展带头人，横向强化利益联结

一是培育家庭农场经营能人，持续推动家庭农场适度规模化经营，降低家庭农场获取金融服务的门槛，提高家庭农场社会带动能力；二是鼓励以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乡土精英”为牵头人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力支持各类合作社横向联合组建联合社、投资企业，提高初级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上游经营主体分享产业利润的比例；三是孵化一批县域涉农致富带头人，加强社会宣传和政策引导，增强致富带头人共富意识和辐射带动效果；四是开展普通农户转型升级行动。针对有一定发展基础和潜力的农户，大力开展现代农业技术、经营管理知识和网络技术实用技能培训，鼓励普通农户以发展生产、劳动就业、资产入股等多种方

^① 参见《2021 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价报告》，<http://www.moa.gov.cn/gbzwfwqjd/xxdt/202112/W020211221365374930266.pdf>。

式参与产业建设与发展。开展跨产业链人才培养计划，培养深谙产业链运作规律和发展方向的综合型人才。

4.2 破除链主企业发展障碍，纵向协同提升竞争力

一是增加对涉农链主企业研发的资金支持，鼓励链主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设立研发中心或建立科技创新联盟，开展前沿技术研究和开发，推动技术成果向实践生产力转化。二是重塑链主企业业务模式，引导部分企业从产品加工制造向产业服务提供转型，拓展其产业链服务范围，提升其产业链服务能力。三是构建完善的产业链生态，通过政策和资金扶持，引导小微经营主体融入链主企业的供销链。制定可参考的产业链各环节标准，推动产业链各环节对前后工序产品质量的认同与遵循。推广使用物联网技术，实现设备、仓储和运输工具的智能化管理，提高产业链协同效率和响应速度。四是通过大区域规划提升县域间产业互补、包容性。在省、市层面构建县域间产业协调联席部门，引入区域间产业发展协商机制，对于达到一定水平、纳入重点培育范围的富民产业，可实施“培育保护”措施，引导其他县产业差异化竞争、协调发展^[33]。

4.3 打造数字化支撑平台，促进产业链一体化升级

一是开展县域涉农富民产业数字化服务支持行动。重点强化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云计算平台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以大型数字化平台为主导、本地平台为补充的原则，全面推动农业数字平台建设，实现设备、系统、产品、人员，以及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售后的互联互通，形成覆盖全产业链的数字化网络。重点以大数据赋能产业发展，通过银联大数据、乡村大数据服务，提高产业主体市场分析、决策能力。二是加强涉农产业数字人才支撑体系建设。一方面，要持续面向本土农业生产、加工、服务、管理、销售人员开展数字化技能培训，提高各类产业参与者的数字化素养和技能；另一方面，要结合本地涉农产业发展情况，拓展外部人才投身县域涉农产业发展的渠道、创新其产业参与模式，精准引进各类数字化人才参与产业链建设与发展。

4.4 强化县域涉农富民产业培育配套政策

一是推进关键配套技术研发攻关。开展县域涉农富民产业科技化平台打造行动，瞄准产业链系列技术的关键难题，积极推动孵化、建设一批产业链综合科技创新平台。重点基于“走出去、引进来”的策略，开展科技联合攻关，构建产业链技术难题需求信息平台，动态发布企业技术难题，通过高校院所“揭榜挂帅”等方式引进技术团队联合攻关，形成紧密依托产业链、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研发机制。二是持续强化重点技术转化。积极创新产业发展关键技术转化方式，通过鼓励科技人员的成果入股县域涉农企业，以及建立涉农富民产业专家服务团、科技特派团等方式，将成熟的关键技术引入产业，促进产业链技术持续升级。同时，在政策允许范围内为关键技术转化项目的用地、用能等方面开通绿色通道，确保成果转化及时、高效。三是优化县域营商环境。重点推动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土地政策和投融资政策，将政策红利向涉农富民产业倾斜。积极营造公平竞争的县域市场环境，建立政企对接机制，大力开展县域营商环境评比。同时，重点针对县域涉农富民产业主体完善市场信用体系，实行动态化分类、分级管理，建立和完善各主体失信惩戒机制，确保产业健康、良性发展。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分析了县域涉农富民产业形成的内在机理，探究了其培育困境，提出了培育可行路径。在形成机理方面，分析认为在县域涉农富民产业的初创期，通过产业带头人带动的“横向联合”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在乡村腹地形成小有规模的特色产业；在成长期，通过链主企业的引领实现“纵向延伸”、重塑产业链，在县域地区形成禀赋优势明显的产业集群；在成熟期，依托数字平台等新载体实现主体和功能更加丰富、产业类

型多样的全产业链融合，最终形成县域涉农富民产业。从单一的“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转向“混合一体化”过程中，产业效益得以提高、产业利益联结机制得以完善、产业富民得以充分实现。在培育困境方面，分析认为主体培育、平台支撑的不足明显制约了县域涉农富民产业各阶段的产业链一体化。在突破路径方面，分析认为应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瞄准产业链主体和平台关键“短板”协同发力，在关键技术转化、优化县域营商环境方面做好配套服务。

虽然本文拓展了县域涉农富民产业研究的理论视野，但在未来研究中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究。一方面，可开展特殊类型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等）的富民产业分析；总结乡村振兴示范县、共同富裕示范区发展富民产业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进一步拓展对县域涉农富民产业共富效应的探讨。其中，特别需要分析县域涉农富民产业发展对农村中低收入群体、防范返贫监测群体的能力提升、就业机会共享、收入差距缩小的影响，从而为提升“富民”效果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1] 李婧媛. 我国县域富民产业发展的实践逻辑、重点任务与提升路径 [J]. 区域经济评论, 2023 (4): 100-108.
- [2] 庄天慧, 邱峰, 杨浩. 县域富民产业促进农民共同富裕: 作用机理、现实困境与策略选择 [J]. 改革, 2024 (3): 127-141.
- [3] LIU Y. LI Y. 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 [J]. Nature, 2017, 548 (7667): 275-277.
- [4] 沈宏亮, 张佳, 郝宇彪. 乡村振兴视角下产业扶贫政策的增收效应研究: 基于入户调查的微观证据 [J]. 经济问题探索, 2020 (4): 173-183.
- [5] 梁盛凯, 陈池波, 田云, 等. 中国乡村产业振兴: 时空分异、动态演进及共富效应 [J]. 农业技术经济, 2024 (1): 75-95.
- [6] 黄季焜. 加快农村经济转型, 促进农民增收和实现共同富裕 [J]. 农业经济问题, 2022 (7): 4-15.
- [7] 万俊毅. 中国农业经营组织结构变迁与创新路径 [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22.
- [8] 刘红岩. 中国产业扶贫的减贫逻辑和实践路径 [J].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36 (1): 156-167, 205.
- [9] 胡海, 庄天慧. 共生理论视域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共生机制、现实困境与推进策略 [J]. 农业经济问题, 2020 (8): 68-76.
- [10] 林淑君, 郭凯明, 龚六堂. 产业结构调整、要素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 [J]. 经济研究, 2022, 57 (7): 84-100.
- [11] 钟甫宁, 罗必良, 吴国宝, 等. “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主题笔谈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22 (3): 1-18.
- [12] 廖常文, 张治栋. 产业一体化、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来自长三角城市群的证据 [J]. 经济体制改革, 2023 (6): 62-71.
- [13] 牛若峰. 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的理论框架 [J]. 中国农村经济, 1997 (5): 4-8.
- [14] 范太胜, 潘津. 农业产业链组织演化视角下农产品源头质量安全约束机制设计 [J]. 农村经济, 2018 (4): 65-69.
- [15] 廖祖君, 郭晓鸣. 中国农业经营组织体系演变的逻辑与方向: 一个产业链整合的分析框架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5 (2): 13-21.
- [16] 郑大庆, 张赞, 于俊府. 产业链整合理论探讨 [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1, 28 (2): 64-68.
- [17] 任金政. 乡村振兴“领头雁”的培育与动力激发 [J]. 人民论坛, 2024 (1): 30-35.
- [18] 崔宝玉, 谢煜. 农民专业合作社: “双重控制”机制及其治理效应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4, 35 (6): 60-67, 111-112.
- [19] 张晓山.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趋势探析 [J]. 管理世界, 2009 (5): 89-96.
- [20] 姜长云. 龙头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发展关系研究 [J]. 社会科学战线, 2018 (2): 58-67.
- [21] 韩旭东, 王若男, 郑风田. 能人带动型合作社如何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基于三家合作社的案例研究 [J]. 改革, 2019 (10): 98-107.
- [22] 于苏, 于小悦, 王竹泉. “链主”企业的供应链治理与链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J]. 经济管理, 2023, 45 (4): 22-40.
- [23] 高杨, 姚雪, 白永秀, 等. 有为“链长”赋能绿色低碳农业产业链: 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J]. 经济学家, 2022 (12): 116-124.
- [24] 姜长云. 新时代创新完善农户利益联结机制研究 [J]. 社会科学战线, 2019 (7): 44-53.

- [25] 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课题组, 王小兵, 钟永玲. 农业全产业链大数据的作用机理和建设路径研究 [J]. 农业经济问题, 2021 (9): 90-97.
- [26] 芦千文. 涉农平台经济: 典型案例、作用机理与发展策略 [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18 (5): 63-71.
- [27] 戴春. 平台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 理论分析框架 [J]. 华东经济管理, 2024, 38 (5): 59-68.
- [28] 隋福民. 平台+农户模式: 实现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另一种路径选择 [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2, 35 (3): 5-16.
- [29] 郭芸芸, 胡冰川, 谢金丽. 2020 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分析报告 (二) [N]. 农民日报, 2020-10-31 (4).
- [30] 郭芸芸, 王景伟, 胡冰川, 等. 2021 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分析报告 (二) [N]. 农民日报, 2021-12-18 (4).
- [31] 郭芸芸, 王振东, 胡冰川, 等. 2022 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分析报告 (一) [N]. 农民日报, 2022-12-28 (4).
- [32] 郭芸芸, 王振东, 王景伟, 等. 2023 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分析报告 (二) [N]. 农民日报, 2023-12-27 (7).
- [33] 胡海, 庄天慧. 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影响机理与实证检验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1 (1): 139-151.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Cultivation Challenges, and Solving Path for Agriculture-related County-Level People-Enriching Industr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Chain Integration

ZHUANG Tianhui QIU Feng

Abstract: Developing agriculture-related County-Level People-Enriching Industry (CLPEI) is a key path for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and achieving prosperity.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cultivation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for agriculture-related CLPEIs. The present study holds that the core element for the formation and growth of agriculture-related CLPEIs i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At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agriculture-related CLPEIs achieve horizontal, vertical, and mixed integration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through the driving forces of rural industry leaders, the guidance of leading enterprises in the chain, and the empowerment of digital platforms. In this process, production factors gradually merge, the scale of the industry expands, and the industrial chain upgrades, thereby achieving prosperity for farmers through thriving agriculture. Currently, some regions in China still face limitations in cultivating agriculture-related CLPEIs, such as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y leaders, imbalanced and inadequate growth of leading enterprises in the chain, and weak support from digital platform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this study suggests targeting the critical "shortcomings" of the industrial chain's main players and platforms through coordinated efforts, and providing supportive services in key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county's business environment.

Keywords: County-Level People-Enriching Industry; Industrial Chain Integration; Formation Mechanism

(责任编辑 李 辉 张雪娇)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助力 乡村产业振兴：理论逻辑、 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

◆ 闵 师 青 平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0)

摘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通过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和推动乡村产业结构调整为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本文从资源配置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品牌经济效应和协同共享效应五个维度厘清了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与乡村产业振兴之间的理论逻辑，剖析了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助力乡村产业振兴面临的现实挑战，并据此提出了相对应的实践路径。研究发现，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与维护难度大、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生产能力和管理水平低、品牌难以有效运作等是制约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实现的关键因素。为此，本文提出多措施推进品牌建设、全过程确保品牌品质、全方位优化供应管理和多方面加大政策支持，以提升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效率。

关键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乡村产业振兴

DOI: 10.13856/j.cn11-1097/s.2024.12.003

1 引言

产业振兴是增强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的源泉，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1]。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乡村产业发展，2018年3月8日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乡村产业振兴”这一概念，并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乡村产业振兴本质上是通过调整乡村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发展，实现乡村经济增长，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全面改善乡村聚落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2]。党中央、国务院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以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如2018年出台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2019年发布的《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和2020年公布的《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乡村产业发展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近年来，中国乡村产业取得了较快发展，乡村经济逐渐由传统农业向多

收稿日期：2024-08-2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乡镇农贸市场对农村居民饮食消费与营养健康的影响机理与效果研究”（7210307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经济转型对农村居民食物消费与营养的影响研究”（1104191012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我国粮食安全战略问题研究”（22&ZD079）。

作者简介：闵师（1987—），男，辽宁沈阳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食物经济与粮食安全。

通信作者：青平（1967—），男，湖南汉寿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粮食与食物经济、涉农工商管理，E-mail: qingping@mail.hzau.edu.cn。

元化产业转型,但仍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3-4]。一方面,中国大多数乡村以初级农产品生产为主,农产品产业链延伸受限、农产品同质性高且附加值低、农业要素回报率低;另一方面,乡村产业结构单一、产业发展基础薄弱、高素质劳动力匮乏。如何应对上述问题与挑战、提高乡村产业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高质量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成为目前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建设农业强国的关键任务。

社会各界围绕如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分析影响乡村产业振兴的因素。内部因素侧重于人力资本^[5]、技术发展^[3,6]、产业要素^[7]和产业结构^[8]等方面。例如,有学者从产业融合的视角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县域产业振兴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3]。外部因素则主要从政策^[9]、产业互动和集体经济实力^[10]等角度展开。有学者探讨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乡村产业振兴中的作用,并指出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较好地发挥“中间人”角色,发挥各方优势,进而推动乡村产业的发展^[10]。中国在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进程中仍面临现实条件的约束,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突破口。从理论上讲,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就是依托历史传统和产地区位优势,通过专业化生产、区域公用品牌化运营,塑造农产品的异质性,改变农产品同质性高、替代性强和价格低的特征,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和延长产业链条,进而助力乡村振兴的实现^[11]。党和政府曾多次强调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性和可行性,通过构建“一村一品”等新发展格局,强化农产品地理标志和商标保护,推进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创响一批“土字号”“乡字号”的特色品牌。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是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有力抓手^[12]。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特色品牌的打造^[13]。中国是农业大国,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培植了众多的农产品种类、提高了农产品产量,但众多农产品仍缺乏市场竞争力^[11,14]。近年来,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发展,自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以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以来,一系列政策文件,如《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均将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作为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目前,已有研究对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与乡村产业振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主要聚焦其重要性以及农业产业的关联^[12,15]。一方面,相关学者认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在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刘敏认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在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12];黄启发等也强调在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建设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手段^[15]。另一方面,相关学者认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能够推动农业产业化、发挥减贫增收作用^[16-18]。部分研究表明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在提高农产品知名度、改善农产品质量、畅通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16-17]。周立和罗建章也强调了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在促进产业集聚和带动区域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18]。然而,上述研究仅强调了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在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中的作用,缺乏对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学理阐述,既没有从理论上说明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如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又缺乏从现实角度探讨当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所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本文旨在探讨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理论逻辑,明确其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与挑战,并立足于现实制约提出相应的实现路径。第一,本文阐释了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内涵特征和乡村产业振兴的本质要求,并从资源配置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品牌经济效应和协同共享效应五个方面探讨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理论逻辑。第二,从品牌建设与维护难度大、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生产能力和管理水平低、品牌难以有效运作等方面深层次分析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助力乡村振兴产业实现的现实挑战。第三,从多措施推进品牌建设、全过程确保品牌品质、全方位优化供应管理和多方面加大政策支持来提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路径。本文从理论与实践层面阐释了建设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作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在农业强国建设背景下如何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理论分析了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内在逻辑

辑。通过探讨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如何促进乡村产业的发展,明确了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在乡村产业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结构升级、品牌经济和协同共享等方面的关键作用,丰富了乡村产业振兴助推因素理论研究。第二,辨识了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助力乡村产业振兴面临的现实挑战。通过深入分析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实现的现实挑战,有助于更好地把握现阶段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存在的问题,充实了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相关研究。第三,提出了加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路径,为相关配套政策设计提供价值参考和决策依据。

2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理论逻辑

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在于促进农村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乡村产业的质量和效益,实现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建设能够有效推动农产品品牌化、规模化生产,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实现。本文主要从资源配置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品牌经济效应和协同共享效应五个视角探讨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理论逻辑(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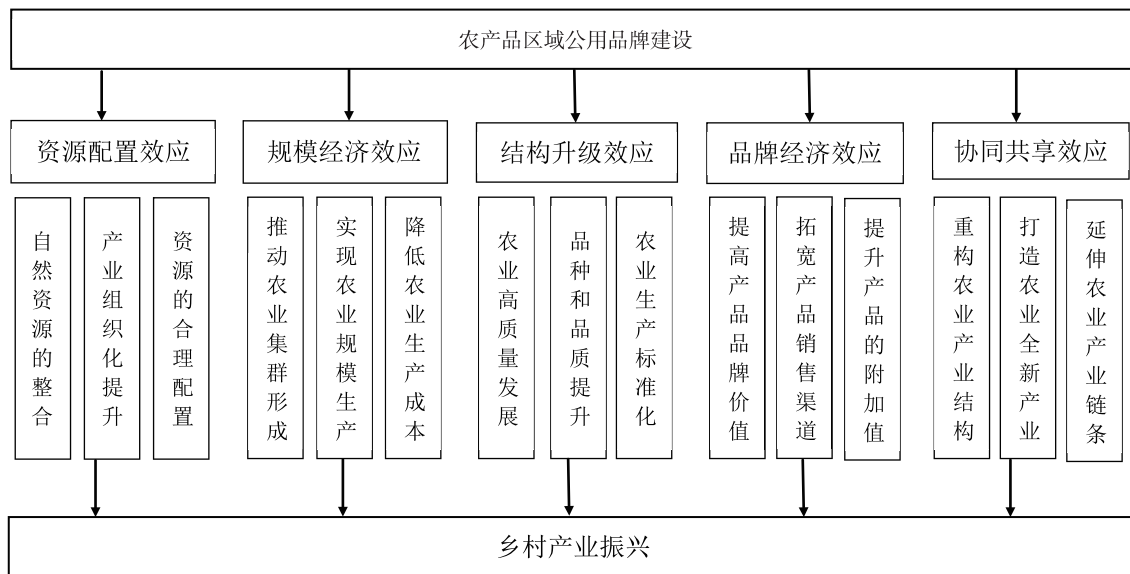


图1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理论逻辑

第一,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通过区域自然资源赋能资源配置效应助推乡村产业振兴。一是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能够整合地域内分散的自然资源^[19]。传统的小规模、分散化的农业生产模式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也影响农产品的质量和市场竞争力^[19]。在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引领下,整合区域内丰富的自然资源,生产出具有地方特色和优势的农产品,能够提升农产品整体的市场认知度和竞争力,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现。二是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有利于产业组织化程度的提升。在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推动下,生产者、加工企业和销售商之间的合作将更加紧密^[20]。同时,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通过建立统一的市场标准和认证体系,能够促使生产者采用标准化的生产和管理方式,进而减少生产和经营的盲目性,增强对市场需求的响应能力,提升产业链条各环节的运行效率。三是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21]。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建设能够促使政府和企业更加注重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例如,通过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地方政府可以引导农民进行标准化生产,合理规划耕地和水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第二,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通过发挥产业规模效应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一是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有助于形成特色农业产业集群^[21]。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聚焦地方特色资源,通过统一的品牌形象和市场推广,

形成特色农业产业集群。这使得农产品从零散型转变为集中型,并逐步在消费者的心中从“土特产”转变为“商品”^[21]。二是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动了农业规模化生产^[23]。品牌的影响力提升了农产品的市场需求,鼓励农民和企业进行规模化生产。规模化生产不仅提高生产效率,还通过成本分摊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此外,大型生产设施和机械化设备的使用在规模化生产中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三是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有助于降低农业生产成本^[23-24]。品牌推广带来了规模效应,降低了采购成本。通过集中采购和大批量生产,生产者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取原材料和生产设备。同时,标准化生产流程和技术的推广也减少了生产中的浪费和损失,进一步降低了生产成本。综上所述,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为乡村带来产业的集聚发展,形成特色农产品产区,由此带来了规模效应及资源聚集,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第三,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通过发挥结构升级效应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一是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能够引导农业生产向高附加值和高质量方向发展^[20]。通过打造和推广具有地域特色的品牌,鼓励农民和农业企业转型升级,推动农业从传统的资源消耗型向技术驱动型、绿色可持续型转变,从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二是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加速了农产品品种培优和品质提升^[24]。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建立能够鼓励科研机构和企业针对地方特色品种进行改良和研发,进一步提高产品的市场认可度。同时,品牌的声誉和市场反馈会促使农业生产者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农产品品质从而得到提升。三是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推动了生产的标准化^[20]。品牌化管理促使相关企业和农户采用统一的生产标准和质量控制体系,形成规范化的生产链条,从而提升产业运作效率。农业生产标准化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还有助于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性。此外,标准化生产还能够减少农业生产中的不确定性,提升产品的整体质量和市场稳定性,减少假冒伪劣产品,增强消费者信任感^[25]。综上所述,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能够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和标准化生产,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重要支持。

第四,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通过品牌经济效应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一是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提升了农产品的市场认知度和品牌价值。通过长期的生产积累和消费者的认可,某些农产品的声誉逐渐与其产地结合,形成强大的区域品牌效应,从而提升了市场竞争力。例如,五常大米、吐鲁番葡萄、烟台苹果等都是具有良好声誉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二是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拓宽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14]。传统农业生产中市场销售渠道较为单一,面临销售渠道窄、竞争激烈等问题。而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通过提高农产品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使农产品进入更广阔的交易市场。此外,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还可能带来更为有效的市场推广和销售策略,进一步扩大农产品的市场覆盖范围。三是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区域公用品牌因其良好的区域品牌声誉,能在市场中获得较高溢价,从而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11-19]。同时,品牌价值的提升使得产品的市场定位更加高端,从而为生产者带来更高的经济收益,进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26]。故而,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能够通过提升农产品市场认知度和品牌价值、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和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显著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第五,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通过协同共享效应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一是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建设有利于乡村产业结构的融合重构。通过统一的品牌形象和标准化的管理体系,不同乡村间的优势资源得以更高效整合,从而形成产业联动效应^[27-28]。例如,某地区以绿色有机农产品为主打,通过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支持,可以整合当地的种植、加工、销售等环节,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二是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能够促进农业全新产业的打造。面对市场竞争加剧和生产成本上升的挑战,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通过提升品牌溢价和市场认知度,推动农产品实现升级换代,打造农业全新产业。例如,通过品牌认证的有机农产品。三是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能够延伸农业产业链,促进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11]。随着市场需求和居民消费的升级,农产品加工、农业旅游、农村电商等衍生产业逐渐兴起。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在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的的同时,也拓展与农产品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机会,带动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总体而言,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能够赋能乡村产业结构融合重构,打造农业全新产业和延伸农业产业链,有力促进了乡村产业振兴。

3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助力乡村振兴的现实挑战

3.1 品牌建设与维护难度大，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主要体现在品牌认知度低、品牌推广不足以及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等方面。这些问题导致品牌建设与维护难度较大，尤其在日趋激烈的农产品市场竞争下，制约了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在助力乡村振兴中的关键作用。

3.1.1 品牌认知度低，品牌形象和品牌标准难统一

当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普遍存在品牌认知度低、品牌形象和品牌标准难统一的问题，严重制约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一方面，品牌认知度低使得消费者对区域农产品的认知和信任不足，导致其在市场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大打折扣。尽管各地积极推动区域公用品牌的建设，但由于缺乏整体规划，对农产品品牌的定位和差异化也缺乏研究，品牌特色不明显，品牌认知度低^[29]。数据显示，吉林省注册的水稻品牌超过 100 个，但在全国范围内的认可程度仍较低。另一方面，品牌形象和标准的不统一进一步加剧了该问题。同一区域公用品牌因不同生产者在产品质量、包装设计、营销策略等方面存在差异，品牌形象混乱且不稳定，消费者难以形成对品牌的稳定认知，致使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度下降，进而影响了品牌的忠诚度和市场接受度。此外，缺乏统一的品牌标准也使得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以次充好的现象损害了品牌形象，也降低了区域公用品牌的市场竞争力^[30]。

品牌认知度低直接导致消费者对地方农产品的信任缺失，进而影响了销售和市场拓展，不利于乡村产业的健康发展。农民和生产者在缺乏品牌效应的情况下，往往难以获得合理的经济收益，其生产积极性较低，进一步影响到乡村产业的发展。此外，农产品区域品牌推广不足难以有效化解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消费者在选择时识别难度仍旧大，降低了品牌的重复购买率^[31]。消费者一旦对品牌的认知和信任产生负面效应，可能会对地方特色农产品产生抵触情绪，进而影响整个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品牌标准的缺失使生产者在产品质量控制上缺乏明确的指导，导致市场上出现劣质产品，损害了区域公用品牌的声誉。

3.1.2 品牌推广不足，品牌忠诚度低和市场竞争压力大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发展面临着品牌忠诚度低与市场竞争压力大的双重挑战。虽然国家和地方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来推动地方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但实际的品牌推广力度仍显不足。一方面，许多区域品牌在推广过程中主要依赖于碎片化的广告宣传，没有将传统媒体及现代化的品牌传播策略有效结合^[22]。由于缺乏有效的品牌传播策略，导致区域公用品牌农产品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不够，消费者对这些产品的了解和信任程度不足，从而对区域农产品的忠诚度较低。另一方面，区域品牌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市场。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者的选择变得更加多样化，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然而，在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过程中，各地区资源整合与统筹力度不足，公用品牌小而分散，导致区域公用品牌未能得到消费者认可，阻碍了公用品牌整体实力的发挥^[30-31]。《中国农业品牌目录 2019 年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数据显示，我国有超过 70% 的公用品牌价值严重偏低，品牌价值贡献不足 30%。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广问题阻碍了乡村产业发展。品牌推广不足导致消费者对地方特色农产品的认知度低，使得农产品区域品牌价值未得到充分利用。中国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超过 200 亿元的占比 10%，超过 500 亿元的仅为 4%。农产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在缺乏品牌效应的情况下，往往难以获得合理的经济回报，这不仅削弱了其生产积极性，也影响了对农业产业的投入。尤其在较大的市场竞争压力下，地方特色农产品在价格和质量上的竞争力不足，部分生产者为了追求短期利益，可能会降低产品质量，导致市场上出现劣质产品，甚至出现假冒品牌，让消费者失去对区域农产品的信任^[32]。此外，在品牌忠诚度低和市场竞争压力的双重影响下，地方特色农产品在市场中的生存空间不断缩小，加剧了乡村产业的萧条凋敝。

3.1.3 质量参差不齐，品牌认证和质量监管不完善

质量参差不齐是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的重要阻滞，这不仅影响了品牌形象的建立，也制约了消费者对地方特色农产品的信任与消费意愿。区域公用品牌的农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主要源于生产环节的标准化程度不足和技术水平的差异。在一些地方，农产品的生产者往往缺乏必要的技术培训和科学管理，导致产品在种植、采摘、加工等环节的质量控制缺乏系统性与规范性。此外，品牌认证机制的不完善使得一些低质量产品，甚至是假冒伪劣产品以区域公用品牌的名义进入市场，压缩了优质农产品的空间。以福州茉莉花茶为例，福州茉莉花茶的年产量大概在 200 吨，而市场上销售的福州茉莉花茶产品竟高达万吨以上，可见约有 80% 的市场份额被山寨福州茉莉花茶占据。而这些问题的产生往往源于质量监管的缺失，使得市场上劣质产品的流通得以滋生，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30]，这不仅破坏了原有的市场价格机制，还损害优质农产品生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造成市场紊乱。

区域公用品牌的农产品质量关系到乡村产业的竞争力，影响着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的成效。农产品质量的参差不齐直接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引致地方特色农产品的市场认可度降低，进而制约了销售渠道的拓展和市场份额的增长。消费者在面对多样化的产品选择时，往往倾向于选择知名度高、质量有保障的品牌，而弱势区域公用品牌农产品质量的不确定性，降低了消费者的购买意愿。缺乏有效的品牌认证和质量监管，使得一些农民在追求短期利益的驱动下过于追求产量而忽视质量，导致农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使得地方特色品牌的声誉受到严重影响^[32]。此外，乡村产业振兴需要依赖品牌的力量来提升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而品牌建设的滞后则使得乡村产业的整体发展动力不足，难以实现高质量发展。

3.2 生产能力和管理水平低，品牌难以有效运作

受生产能力和管理水平的制约，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在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过程中，面临着供应系统薄弱、农民参与意愿不足和政策落实不力等多重挑战。例如，许多农户缺乏管理知识和品牌运作的相关技能，往往对参与品牌建设的积极性不高，导致品牌运营缺乏有效的参与和支持，无法形成良好的品牌生态。这些因素不利于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健康发展，难以形成支撑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基础。

3.2.1 供应系统薄弱，产品供应和市场反应不及时

供应系统薄弱带来的产品供应和市场反应不及时是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当前，许多地方特色农产品由于缺乏完善的供应链管理和高效的物流体系，导致产品在生产、加工和销售环节之间的衔接不畅^[33]。具体而言，农产品生产周期和市场需求之间存在较大时间差，农产品生产者在应对市场变化时往往无法及时调整生产计划，造成产品滞销或供不应求。此外，由于信息传递不畅，农产品生产者对市场需求的反应迟缓，导致市场上出现了供需失衡的现象。例如，部分农产品具有较强的季节性，由于生产者未能及时获取市场需求信息，大量农产品在收获后面临滞销困境，进而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经济损失。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预测和分析，部分区域农产品在产品质量、规格和包装等方面无法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及时调整，进一步削弱了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市场竞争力。

供应系统的薄弱使得农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下降，直接影响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农产品的滞销不仅导致农民收入的减少，还使得乡村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乡村产业振兴依赖农产品的持续供给和市场的有效对接，而供应链系统薄弱使得这一目标难以实现，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产业发展脆弱性。与此同时，农产品的市场反应不及时，导致消费者对地方特色品牌的认知度和信任度降低，进而影响了品牌的市场形象和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此外，乡村产业的振兴还需要政策支持和市场引导，但在供应链薄弱的背景下，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往往大打折扣，难以形成有效的推动力。

3.2.2 参与意愿不足，管理知识和品牌运作不适应

在当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过程中，农业经营相关主体参与意愿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许多农产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受小农经济思想的约束，对于公用品牌价值的认知有限，缺乏参与公用品牌建设创建与维

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品牌运作的过程中,管理知识的匮乏使得生产者在品牌定位、市场营销、产品质量控制等方面的能力不足,导致品牌形象塑造和市场推广的效果不佳。许多农业经营相关主体对品牌运作的理解停留在表面,未能深入掌握品牌构建的核心要素和市场运作的基本规律,从而导致品牌缺乏竞争力和市场认可度^[34]。此外,由于缺乏系统的培训和指导,在品牌建设过程中常常存在农民知识断层和经验不足的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农民参与意愿不足的现象,使得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在市场中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制约了品牌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经营相关主体参与意愿不足和管理知识缺乏,使得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在市场中无法形成有效的竞争优势,进而影响了乡村产业的发展。当前,许多地方的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仍显薄弱,导致农产品的市场认知度显著降低,消费者对地方特色产品的信任度也随之下降,使得农民在销售农产品时面临较大的困难,不仅影响了农民的经济收益,也削弱了他们对品牌建设的参与意愿^[35]。此外,区域公用品牌的弱化使得地方特色产品在市场中处于边缘化状态,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进一步制约了乡村产业的多元化发展。

3.2.3 政策落实不力,品牌建设和品牌管理缺乏支持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在当前乡村经济发展中缺乏政策支持,尤其在品牌建设和品牌管理方面。尽管国家和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在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作用,但在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支持力度不足、政策体系不完善等现象仍然突出^[36]。许多地方在品牌建设方面缺乏系统性的规划和指导,导致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建设往往处于盲目状态,缺少科学的品牌定位和 market 分析,市场竞争力较弱^[37]。2021年湖南省柑橘产量已突破643.2万吨,尽管湖南省已经创建了“宜章脐橙”“麻阳冰糖”等多个区域品牌,但单点式的品牌建设较为分散,难以形成品牌效应。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进一步加剧了品牌管理的复杂性,而缺乏必要的政策监管支持使得公用品牌的维护陷入困境。同时,由于品牌监管不足,农业品牌侵权频发,2020—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295起农业品牌司法诉讼案例。政策支持不足削弱了品牌建设的效果,政府和市场难以全面有效监管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导致品牌形象的模糊和市场认知度下降,形成了公用品牌的“公地悲剧”。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建设不仅是提升农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更是推动乡村经济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然而,缺乏有效政策支持的品牌建设和品牌管理,使得乡村产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37]。此外,为了追求短期的利润,农产品生产可能采用粗放式生产,通过采用大量化肥和农药来提高农产品产量,而忽略了产品的品质和品牌建设的要求,导致消费者对地方特色产品的认知度和信任度下降,进而影响了消费决策和购买行为。在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过程中,由于品牌的缺失和管理不善加剧了这一目标实现的难度。

4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路径

4.1 典型案例:秭归脐橙

秭归脐橙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是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典型范例。秭归脐橙是中国著名的优质脐橙品种之一,产于湖北省秭归县。秭归县位于长江中下游,土壤肥沃,气候条件适宜,具备优越的柑橘生长环境,是全国唯一“一年四季有鲜橙”供应的柑橘产区。近年来,秭归脐橙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2023年5月,秭归县已注册684个柑橘商标,打造了“秭归脐橙”等4个区域农产品公用品牌。秭归脐橙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到60.18亿元,是唯一一个品牌强度“五力”均跻身前10位的果品区域公用品牌。随着秭归脐橙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不断壮大,对乡村产业的带动作用越发明显,不仅带动了当地脐橙的销售,而且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在增加农民收入、吸纳就业人口、推动产业升级等多个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逐渐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秭归县采取多项举措推进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建设。一是秭归县政府和相关部门明确提出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建设目标。通过制定品牌运营管理办法,加强品牌保护和授权管理,构建区域公用品牌与企业品牌协同发展模式,以把秭归脐橙打造成“世界级地标品牌,世界级文化载体”为目标。同时,秭归县致力于“秭归脐橙”品牌建设,融合“屈原文化”“楚文化”等当地特色传统文化内容,迭代升级“秭归脐橙”品牌内涵,构建品牌宣传矩阵,全面提升市场影响力。二是加强质量管理与标准化。秭归县不断提升农业标准化、现代化水平,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培育新品种,运用新技术,引进国内领先的脐橙精细分选生产线,保证了脐橙产出品质和供应链的稳定。同时,发布系列柑橘种植标准,开展秭归脐橙品质提升“1+N”行动,加速柑橘生产全流程关键设备提档升级,助力秭归脐橙商品果价值大幅上升。三是面对市场对“品牌农产品”旺盛需求,秭归县持续做大做强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三大主体,加大对秭归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建设力度,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同时,开展精深加工延伸品牌产业链,坚持横向龙头带动、纵向精深加工,实现千家万户小种植与千变万化大市场有效对接。四是坚持绿色发展。秭归是“全国绿色食品(柑橘)生产基地先进示范县”,通过采用“绿肥+有机肥+水肥一体化”的“传统+现代”水肥利用模式,创新了一套“四挂一铺”绿色防控技术,减少化肥农药的施用,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实现秭归脐橙绿色、生态、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还合理布局早中晚熟品种生产基地,突出四季鲜橙特色。

秭归脐橙区域公用农产品品牌建设提高了秭归县脐橙的知名度,推动了当地乡村产业振兴和农村经济发展。自秭归县区域公用农产品品牌建设以来,秭归脐橙的市场认知度显著提高,销售量和销售额均有所增长。品牌溢价的提升使得农民的收入增加,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数据显示,秭归脐橙的市场价格较普通脐橙上涨了20%~30%,为当地农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同时,区域公用品牌的建设成功提升了秭归县的农产品竞争力,也促进了乡村产业的振兴。秭归县还在脐橙产业链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升级,推动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包装、物流、销售等,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此外,品牌推广带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体验和购买脐橙。秭归脐橙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案例充分展示了区域公用品牌在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明确品牌定位,注重高品质;严格控制质量,从生产到销售都确保了产品的优质;农户和企业的积极参与,为品牌的成功奠定了基础;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始终,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秭归脐橙的成功经验为其他地区推动本地特色农产品的品牌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借鉴,展示了区域公用品牌在乡村产业振兴中的巨大潜力。

4.2 对策建议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成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对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具有重要的作用。基于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助力乡村产业振兴面临的现实挑战和秭归脐橙成功的案例,本文从多措施推进品牌建设、全过程确保品牌品质、全方位优化供应管理和多方面加大政策支持视角出发提出实践路径(图2),以期为推动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4.2.1 明确品牌定位,多措施推进品牌建设

明确品牌定位、构建品牌建设体系以及加强市场推广与宣传是推进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路径。第一,明确区域农产品品牌定位^[38]。组织相关专家和市场调研机构对地方特色农产品进行深度剖析,明确其独特性和市场需求,制定相应的品牌定位策略。通过对目标消费群体的细分,结合地方文化、生态环境和生产特色,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牌形象,使消费者能够准确识别和认同,从而增强品牌的市场影响力。第二,构建农产品品牌建设体系。引导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主体,建立专业化的品牌管理团队,负责品牌的维护与推广^[39]。同时,设立品牌发展基金,支持品牌管理活动,鼓励创新和市场拓展,提升品牌的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第三,加强市场推广与宣传。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进行多渠道品牌宣传,结合线上线下活动如展销会和品牌推介会,提升消费者认知和信任。同时,鼓励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参与区域公用品牌的建设并与媒体合作发布品牌建设成果与故事,增强品牌文化内涵和情感共鸣,提升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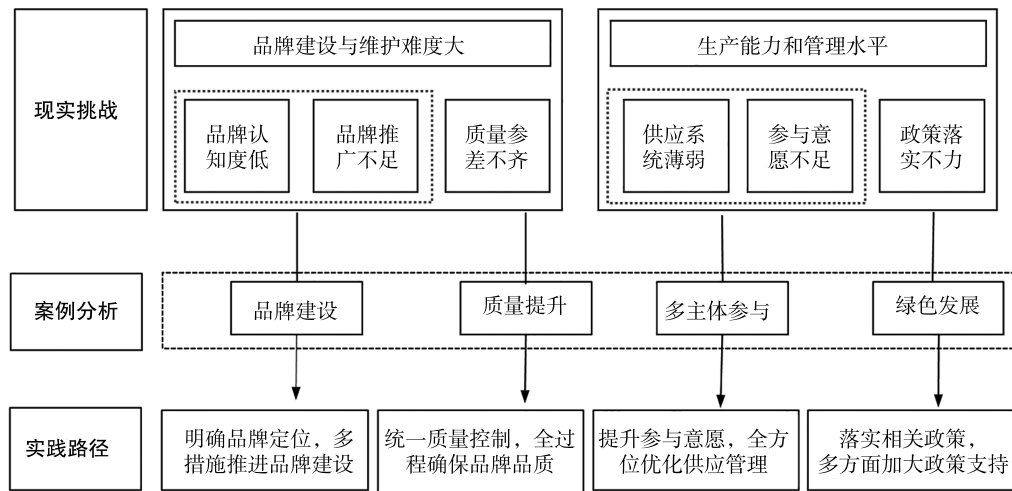


图2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4.2.2 统一质量控制，全过程确保品牌品质

通过建立系统的质量控制体系、强化生产标准化管理以及推动品牌认证与追溯机制建设，可以有效提升农产品的品质，进而增强品牌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乡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第一，建立系统的质量控制体系。积极引导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涵盖从农产品生产、加工和产品销售等环节，确保各环节都符合相应的质量标准。同时，引入第三方检测机构，不定期对使用区域公用品牌的农产品进行质量抽检，把品牌农产品做成优质放心的农产品^[40]，增强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度和满意度。第二，强化生产标准化管理。推动农业生产的标准化以提升农产品的质量水平，制定统一的生产技术规范和操作流程，以确保产品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引导农民和生产者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和设备，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第三，推动品牌认证与追溯机制建设。积极推进区域公用农产品的品牌认证工作，鼓励农业经营主体申请国家和地方的优质农产品认证，以增强品牌公信力；同时，建立健全农产品追溯机制，采用信息化手段记录和追踪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流通过程，确保消费者能够方便地查询到产品的来源和质量信息。

4.2.3 提升参与意愿，全方位优化供应管理

提高农户参与意愿、加强农民合作社的组织建设、推动信息化供应链管理，能够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助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第一，提高农户参与意愿。通过加强宣传和教育，提升农民的品牌理念和品牌保护意识，提高农户参与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意愿。此外，还可以通过财政补助、稳定市场价格、培训和技术指导等手段，激发农民参与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积极性^[37]。第二，加强农民合作社的组织建设。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鼓励农民加入合作社，实现规模化经营，并在合作社内部，建立健全利益分配机制，确保每位成员都能享受到合作带来的经济收益，强化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发挥好合作社的中介作用，促进各主体形成合力，提高区域品牌的影响力。第三，推动信息化供应链管理。鼓励农业经营主体采用信息化工具，建立高效透明的供应链体系。通过信息化手段获取市场需求信息，合理进行生产要素配置，减少资源浪费。同时，利用信息化技术建立高效透明的供应链体系，提高农产品流通的效率，缩短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时间，确保产品的新鲜度和质量，增强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度。

4.2.4 推动绿色发展，多方面加大政策支持

加强绿色农业生产的政策引导、完善市场激励机制，以及建立健全品牌认证与监管体系，有助于强化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助力乡村振兴的实现。第一，加强对绿色农业生产的政策引导，鼓励农民采用生态友好的生产方式^[41]。通过出台相关补贴政策和技术支持，引导农民向绿色生产模式转型。例如，组织技术培训和示范活动，帮助农民掌握绿色生产的相关知识技能，提升农民的绿色生产技术和绿色生产意识。第

二,完善市场激励机制。出台相关政策为自愿参与绿色认证的区域公用品牌提供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品牌的市场竞争力。政府还可以通过与大型电商平台合作,开展绿色农产品专属促销活动,提高品牌的市场曝光率。第三,建立健全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认证与监管体系。联合行业协会、科研机构等,制定明确的品牌认证标准和监管机制,从源头上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定期开展品牌评比和质量抽检,加强对区域公用品牌的监督管理,形成良好的品牌竞争环境,激励农民和企业生产环节提升标准和管理水平,提高整体生产质量,实现共同发展与共赢。

参考文献

- [1] 李庆霞,孙熙雯.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N]. 光明日报, 2024-05-28 (11).
- [2] 杨筱明. 浅谈产业振兴助推乡村振兴的几点思考 [EB/OL]. (2023-12-11) [2024-06-22].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4965264799642375&wfr=spider&for=pc>.
- [3] 田红宇,孟娜娜,关洪浪. 数字金融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效应与路径研究:来自产业融合视角的经验证据 [J]. 世界农业, 2024 (8): 77-89.
- [4] 孔祥智.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J]. 农村金融研究, 2018 (2): 9-13.
- [5] 邓悦,蒋琬仪. 城乡教育资源不平衡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 [J]. 管理学刊, 2023, 36 (1): 33-42.
- [6] 田野,叶依婷,黄进,等. 数字经济驱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内在机理及实证检验:基于城乡融合发展的中介效应 [J]. 农业经济问题, 2022 (10): 84-96.
- [7] 刘赛红,杨颖. 金融资源配置与乡村产业振兴的交互作用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J]. 经济问题, 2021 (11): 98-106.
- [8] 杨水根,王吉. 流通数字化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机理与效应 [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2 (2): 1-14.
- [9] 龙井然,杜姗姗,张景秋. 文旅融合导向下的乡村振兴发展机制与模式 [J]. 经济地理, 2021, 41 (7): 222-230.
- [10] 周娟.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乡村产业振兴中的作用机制研究:以“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模式为例 [J]. 农业经济问题, 2020 (11): 16-24.
- [11] 董银果,钱薇雯.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中的“搭便车”问题:基于数字化追溯、透明和保证体系的治理研究 [J]. 中国农村观察, 2022 (6): 142-162.
- [12] 刘敏. 助力乡村振兴打造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N]. 人民日报, 2023-08-23 (9).
- [13] 张立畅.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J]. 红旗文稿, 2023 (22): 30-33.
- [14] 徐大佑,郭亚慧. 农产品品牌打造与脱贫攻坚效果:对贵州省9个地州市的调研分析 [J]. 西部论坛, 2018, 28 (3): 100-106.
- [15] 黄启发,钱丹晴,方静.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江苏省句容市丁庄村的例证 [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5 (5): 60-69, 85.
- [16] 李大垒,仲伟周. 农业供给侧改革、区域品牌建设与农产品质量提升 [J]. 理论月刊, 2017 (4): 132-136.
- [17] 李道和,叶丽红,陈江华. 政府行为、内外部环境对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整合绩效:以江西省为例 [J]. 农业技术经济, 2020 (8): 130-142.
- [18] 周立,罗建章. 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助力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策略组合:基于陕西“袁家村”的案例分析 [J]. 宏观质量研究, 2024, 12 (1): 15-30.
- [19] 夏龙,姜德娟,隋文香. 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空间分布与增收效应 [J]. 产经评论, 2015, 6 (1): 78-91.
- [20] 陈文胜. 论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以区域地标品牌为战略调整农业结构 [J]. 农村经济, 2016 (11): 3-7.
- [21] 沈鹏熠. 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形成过程及其运行机制 [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1, 32 (5): 588-591.
- [22] 高芸,赵芝俊,张鸾,等.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创建与维护机制研究:新西兰麦卢卡蜂蜜案例的经验与启示 [J]. 世界农业, 2023 (12): 43-54.
- [23] 马清学. 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模式研究 [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37 (1): 142-144.
- [24] 李佛关,黄玲丹,张焱.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生态圈成长路径及形成机理:基于涪陵榨菜的纵向案例研究 [J]. 宏观质量研究, 2024, 12 (4): 115-126.
- [25] 韦光,左停. 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与“地理标志”区域品牌建设:基于SWOT分析框架的战略选择研究 [J]. 经济界,

2006 (2): 90-96.

- [26] 王岱, 杨琛.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产品品牌战略研究 [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18 (4): 134-137.
- [27] 张林, 温涛, 刘渊博.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 理论机理与实证判定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46 (5): 42-56, 191-192.
- [28] 刘诗羽, 陈江华, 李道和.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对农民增收的影响: 基于茶叶区域公用品牌视角 [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23 (1): 108-120.
- [29] 杨旭, 李竣. 县级政府、供应链管理与农产品上行关系研究 [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3): 81-89, 156-157.
- [30] 胡胜德, 王伟森. 韩国农特产品共同品牌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19 (3): 89-96.
- [31] 潘燕, 关海玲. 我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模式、影响因素与日本经验启示 [J]. 商业经济研究, 2023 (6): 101-104.
- [32] 张德海, 双海军, 邱晗光.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协同治理: 理论构建及案例证据 [J]. 农村经济, 2024 (4): 48-57.
- [33] 许朗, 高珊, 许才明.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 [J]. 江苏商论, 2020 (1): 8-11.
- [34] 孙玉玲, 颜锋. 基于价值体系下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路径 [J]. 商业经济研究, 2022 (4): 150-152.
- [35] 焦翔, 辛绪红, 孙布克. 乡村振兴战略下品牌农业的作用解析与路径研究 [J]. 农业经济, 2021 (8): 55-56.
- [36] 张可成, 王孝莹. 我国农产品品牌建设分析 [J]. 农业经济问题, 2009 (2): 22-24.
- [37] 李道和, 叶丽红, 陈江华. 政府行为、内外部环境与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整合绩效: 以江西省为例 [J]. 农业技术经济, 2020 (8): 130-142.
- [38] 王伦, 张诗含, 宦锦瑶, 等. 区域公用品牌与价值共创视角下茶企品牌高端化研究: 以杭州狮峰茶叶有限公司为例 [J].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2023, 16 (5): 538-549.
- [39] 李彦亮. 农产品品牌体系构建战略研究 [J]. 人民论坛, 2013 (11): 72-73.
- [40] 王庆五, 吕永刚. 打造政府与市场的“双强引擎” [N]. 新华日报, 2018-05-22 (13).
- [41] 刘海洋. 乡村产业振兴路径: 优化升级与三产融合 [J]. 经济纵横, 2018 (11): 111-116.

The Role of Regional Public Brand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Theoretical Logic, Realistic Challenge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MIN Shi QING Ping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public brand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jects new momentum into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by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promoting the adjustments of r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s.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theoretical logic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public brand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from five dimensions: resource allocation effects, economies of scale effects, structural upgrading effects, brand economic effects, and collaborative sharing effects. Furthermore, this study also analyzes the realistic challenges faced by regional public brands in assisting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practical pathways.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key factors hindering the constraining of regional public brand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from effectively supporting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are the difficulty of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increasing fierce market competition, low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management levels, and the difficulty of effective brand operat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suggests multiple measures to advance brand construction, ensure brand quality throughout the process, optimize supply management comprehensively, and enhance policy support from multiple aspect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gional public brands construction in boosting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Agricultural Products; Regional Public Brands;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责任编辑 卫晋津 李 辉)